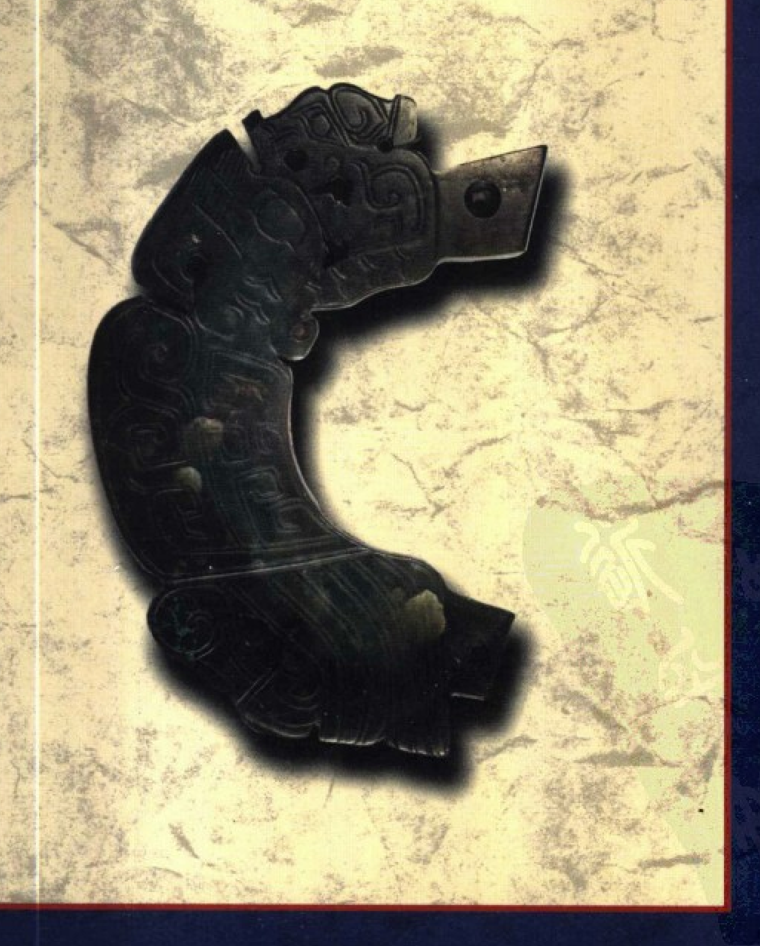
国家文物局 主编

1998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1998



文物出版社

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 in 1998

国家文物局　主编



文物出版社

2000.12



责任编辑

张小舟 李 力

美术编辑

程星涛

责任印制

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国家文物局主编.－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0.12
ISBN 7-5010-1251-2
Ⅰ.1… Ⅱ.国… Ⅲ.考古发现－中国－1998－图录
Ⅳ.K8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 第82101号

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国家文物局 主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 @wemwu.com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2000年12月第一版 2000年12月第一次印刷
787 × 1092 1/16 印张: 8.25
ISBN 7-5010-1251-2/K · 523 定价: 98元

主要撰稿人

颜劲松　江章华　张敬国

贾庆元　刘　锋　朔　知

王根富　李国平　杭　涛

杨亚长　王昌富　张志清

韩维龙　郭木森　李毓芳

冯永驱　王炜林　康兰英

孙周勇　张庆捷　赵瑞民

朱　亮　史家珍　曹国新

赵万钧　张克举　田立坤

万　欣　吕智荣　穆忠民

乌　恩　刘国祥　白劲松

孟凡峰　郭济桥　齐瑞普

杜鲜明　郝建文　沈岳明

权奎山　黄义军　杜正贤

沈自龙　颜　诚　刘海文

贺云翱　邵　磊　王前华

前　言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获得重大进展和突破，建立起极具特色的考古学体系，而且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古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新的科学方法、科技手段的广泛应用，航空遥感考古、水下考古的实施，极大地开拓了考古学科的视野。令人震撼的重大发现接踵而至，连续不断地在国内外产生轰动性影响。伴随着一次次的重要发现，中华历史文化的魅力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了解精深博大的中华古代文化越来越成为了解改革开放的现实中国的重要窗口。

1998年是中国考古学的丰收的一年。全国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开展的重大考古项目有460余项，这些发现时间上上迄史前，下至明清，空间上几乎遍布全国的各个省份，在考古学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安徽凌家滩墓地新石器时代墓葬的再次被发掘以及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的

发掘，丰富了人们对江淮地区史前文化面貌的认识。三星村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保存完好的人骨，为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遗址所罕见。四川郫县古城的中部发掘出一座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型单体房址，据初步推测这座房址可能是大型礼仪性建筑，为认识古城的性质、布局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是近年来在丹江上游地区发现的一处现知二里头与二里岗文化在西南方向最远的遗址，其两期遗存分别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和以郑州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文化内涵基本相同。河南鹿邑隐山遗址发现了一座商末周初的贵族墓，有南北两个墓道，两椁一棺，出土铜铙6件，数量之多，在我国尚属首见。此外还出土了目前最早的排箫实物。东周列国考古一直是考古学中的热点课题，浙江绍兴发掘的印山大墓，以木构墓室和巨大的独木棺葬具为特点，年代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有些学者认为是越王陵，对于深入认识越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汉唐时期及其以后历史时期的考古中，城址、宫殿建筑和墓葬的发掘占有重要地位。1998 年中日联合对汉长安城的桂宫进行发掘，揭示出桂宫二号建筑基址的主殿基址和东西两侧附属建筑及北面庭院，确认了过去不太明确的北宫、桂宫位置。1997 年对广州南越国宫署御苑遗迹发掘中清理出长约150米的石构曲渠和一座石构鼋室，保存基本完整，是御苑水景的重要遗迹，对于研究古代宫苑的布局具有极重要的意义。陕西华阴县华山西岳庙基址的发掘，为研究古代建筑史和西岳庙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资料。通过对宁夏银川西夏陵三号陵园西碑亭的发掘，基本搞清了其地面建筑形制，另外还清理出300多块西夏文残碑块，为解决西夏王陵墓主身份提供了资料。南京明孝陵宫门基址的发掘，为研究明初陵寝宫殿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陕西神木大保当墓葬出土的汉画像石突出反映了雕刻和绘画两种技法，以绘画和敷色为其显著特点，彻底改变了对陕北画像石表现技法的传统认识。南京发掘的东晋名臣高崧家族墓葬和豪族王氏家族墓，是近年来六朝考古的重

要发现，纪年墓中出土的30余件玉器，是迄今为止六朝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的一次。甘肃高台骆驼城的一座西晋墓出土的木板画车马图，画面生动，棺盖上的彩帛墓志属首次发现。河北宣化发现的两座辽代壁画墓共绘有26幅反映墓主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的壁画。北京在颐和园清理了元代耶律铸夫妇合葬墓，该墓为多室砖墓，形制独特。这些墓葬的发掘丰富了人们的认识，为墓葬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边疆地区考古1998年也取得一些成绩。辽宁北票喇嘛洞第五次发掘，清理墓葬370座，一些葬俗上反映的新特点丰富了三燕文化的内涵，同时获得了丰富的三燕文化遗物。喇嘛洞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2世纪末至4世纪中叶鲜卑早期的历史以及对古代朝鲜、日本的影响，都是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通过对内蒙古海拉尔谢尔塔拉1号墓地的发掘，新发现一种7～10世纪的草原民族文化，填补了呼伦贝尔草原该阶段考古学的空白。

瓷窑址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1998年陶瓷考古在北方地区主要是对河北井陉窑遗址的清理，南方的发现则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在慈溪发现寺龙口窑址，首次在越窑遗址中发现南宋龙窑，此外南宋地层中还出土了外底阴刻“官”字的匣钵，证实南宋初期宫廷曾在此征烧宫廷用瓷。杭州老虎洞宋元窑址清理出南宋时期的窑炉和作坊，初步确认老虎洞南宋窑址即为修内司窑。

为配合三峡大坝工程建设开展的文物抢救工程，是中国最大的文物抢救工程，通过大面积揭露，已初步建立了峡江地区古文化的年代序列。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发掘证明澎溪河流域是古代巴人分布的一个区域性中心，忠县崖脚墓地发现了20座典型的楚墓，是迄今重庆库区发现的最西端的楚墓，对于研究战国中晚期巴楚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配合黄河小浪底库区工程，对淹没区内的黄河两岸古栈道进行的调查中，在黄河北岸发现了总长5000多米的黄河古栈道遗迹和大量汉唐时期的题记，在河南新安县盐东村发现了可能具有仓储性质的汉代大型建筑遗址，这些遗迹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代的漕运提供了重要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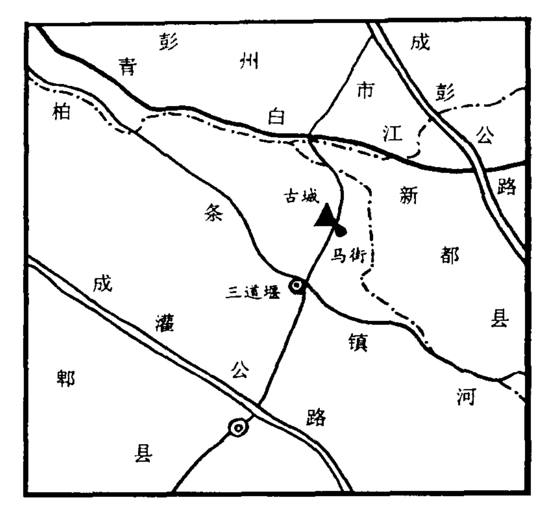
中国地下文物丰富，随着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每一天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但是由于资料整理的滞后和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得这些重要的成果不能及时公诸于世。国家文物局决定每年以快报的形式，将这些成果集中展示。

1998年进行的460多项考古工作，不可能都反映在这个快报上。认识一项考古工作的意义或许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快报本身是为了让更多关心文物事业的人不仅了解到出土器物的精美，更主要的是了解考古工作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工作，关注文物保护工作，认识中国古代光辉而灿烂的文化，这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共同的心愿。

编 者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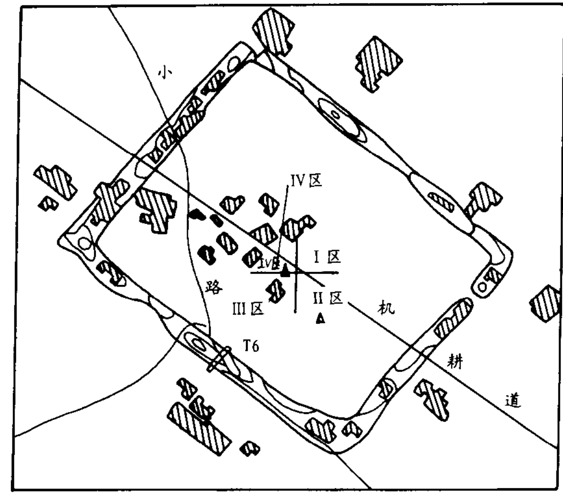
郫县古城遗址位置示意图

四川郫县古城

□ 1996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首次对郫县古城乡古城遗址进行调查、试掘，对该遗址的年代、文化面貌和性质有了初步的认识：该遗址与宝墩、芒城、鱼凫村和双河古城等遗址文化面貌较为一致，虽互有早晚，但其文化一脉相承，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其绝对年代大约在距今4500～3700年。

1997年10月至1998年1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1996年对郫县古城乡古城遗址调查、试掘的基础上，对城内重要遗迹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并选择重要的遗迹进行发掘，同时对城墙进行了解剖，基本搞清了城墙的构筑方法及年代。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发现宝墩文化墓葬1座、房基4座、灰坑10个，并伴出大量的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发现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对揭示该城的性质及探索古蜀文明具有重要价值。

城墙解剖选在南垣中段，垂直于城墙布46×3米的探沟一条。通过发掘，证实现存土垣主体部分为建于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其上叠压汉代及近现代的堆积。城垣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的墙体现存顶宽1.9、底宽10、高2.4米，构筑方法为不规则的堆筑形式。第一期墙下叠压遗址较早的文化层，说明在建城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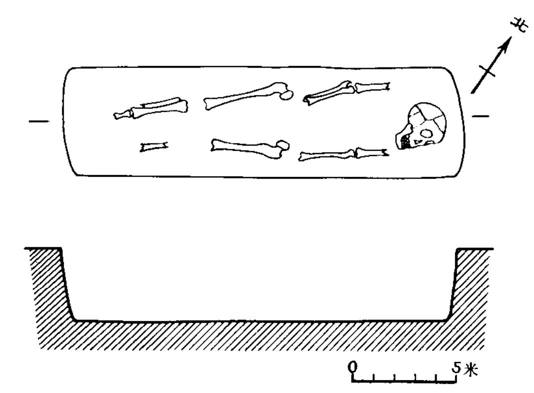
郫县古城遗址平面图

已有聚落存在，并发现文化层、灰坑叠压和打破第一期墙现象。打破第一期墙的灰坑出土有该遗址早期阶段的遗物，因此推测第一次筑城的时间当在遗址早期。第二期墙在一期墙的基础上增筑而成，增筑后的城墙现存顶宽7.1、底宽20、高3米，亦为斜坡堆筑，各堆筑的层面夯筑筑痕不甚清楚。在二期墙的城内侧发现两层属该遗址晚期阶段的文化层叠压在墙上，推测增筑时间当在遗址的晚期偏早阶段。

此次发掘，发现属于遗址早期阶段的竖穴土坑墓1座，位于遗址中部偏东的居住区附近，坑穴狭长，方向58°，头东足西，单人仰身直肢葬，无随葬品。

6号房址平面图

发现14座建筑基址，包括13座小型房基和1座大型房基。小型房基皆为长方形木骨泥墙的地面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6号房址发现于遗址的中部偏东，长8.15、宽5.6米，屋内分布呈十字形排列的柱洞5个，在西墙靠南有一宽1.2米的门道，门朝城的中心开设，铺



20号墓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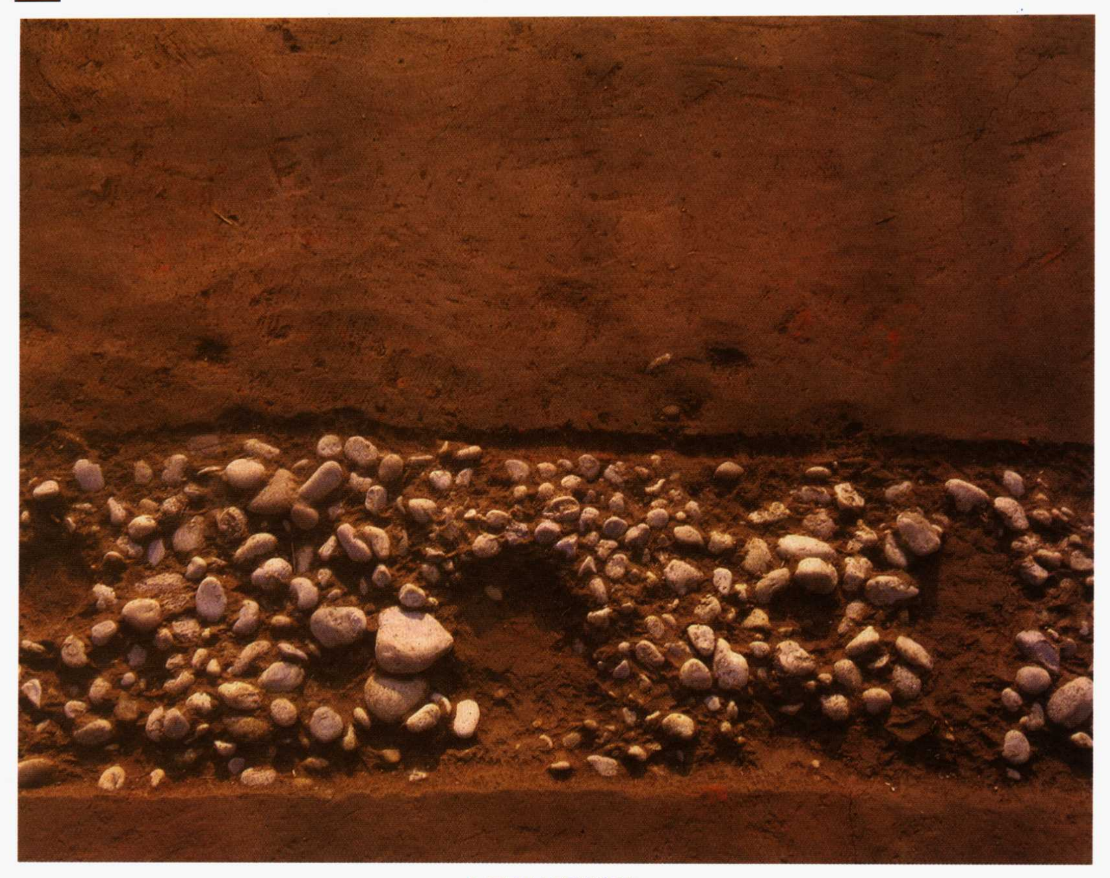
宽约10厘米的小卵石。该房内发现灶坑1个，为长方形浅坑，坑内堆积许多大小不一的卵石。大型房屋建筑基址5号房址位于城的中部，平面呈长方形，方向为西北——东南向，与城的方向基本一致，长约50、宽近11米。该房址保存的仅是基础部分，尽管如此，建筑的规模和总体轮廓还是比较清楚的。该房屋的建筑方法是先挖一个基坑，在基坑周缘铺设卵石，卵石大小以4～6厘米者居多，于卵石中埋设木柱，然后在基坑内垫土，垫土内有意掺大量红烧土防潮，卵石面宽0.8～1、现存厚度0.15～0.28米，卵石中发现的柱洞排列整齐，间距0.7～1.2、洞径0.2～0.3米，推测该房屋的墙体为木柱间编缀竹笆，内外抹草拌泥。由于居住面



发掘现场



13号干栏式建筑遗址



5号房址墙基柱洞



10、11、12号房址的打破关系(F10-F11-F12)



花边口绳纹罐

花边口绳纹罐

盘口圈足尊

宽沿平底尊

遭到破坏，房内的柱洞已不复存在，仅在房内的东端中部发现一直径约 0.65 米的圆形卵石堆积，推测为柱坑底部的础石，像这样的大型建筑内应有顶梁大柱存在。该房址未发现隔墙遗迹，但在屋内发现有5处呈长方形的卵石堆积由东往西有规律地排列，通过解剖发掘，发现卵石周围挖有基槽，槽内埋设密集的圆竹，圆竹已炭化，但清晰可辨。基槽内埋设圆竹可能是做护壁，护壁内填卵石构筑台子，护壁外很可能再抹泥。根据建筑基址附近的地层堆积较纯净，出土的生活遗物极少，也未发现一般的生活附属设施推测，该建筑基址当不属一般的居住址，为大型的礼仪性建筑的可能性较大。依据地层和垫土中出土遗物分析，该房屋建于遗



5号房址发掘现场

址的早期，废弃于遗址的末期。根据目前的发掘推测，郫县古城遗址的布局很可能是以城址中部的大型房屋为中心，四周分布小型建筑。

此次发掘，出土的文化遗物有陶器和石器两大类。陶质分夹砂和泥质两种，陶色以褐、外褐内灰、黑衣陶为主，另有灰、黄、红陶等。陶器纹饰有绳纹、划纹、戳印纹、弦纹、瓦棱纹及镂孔等，其中夹砂陶器装饰以绳纹为主，泥质陶多见划纹。代表性陶器有花边口沿罐、窄沿罐、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壶等。石器为小型的磨制石器，以斧、锛、凿为主。


玉鹰(M29:6)


玉人(M29:14)

安徽含山
凌家滩遗址


玉璧(M9:13)

凌家滩遗址位于安徽省含山县铜闸西南约10公里的凌家滩村，遗址总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以凌家滩遗址为中心，半径约2公里范围内分布着6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1处大型墓地，该遗址为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聚落群。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11月底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此前，1987年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墓地进行过两次小规模发掘。三次总计发掘面积177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44座和祭坛1座，出土文物约1200件，其中玉器约600多件。现将三次发掘成果综述如下。

玉龙(M16:2)

祭坛位于凌家滩墓地中心的最高处，面积约600平方米，主体保存完好。祭坛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和鹅卵石与黏土搅拌铺设而成，中间高四周低，高差达1米多。推测其平面形状为不规则圆角长方形，东部边缘转角明显，北侧向北伸出10米。祭坛自下而上可分为三层，分两次建成。


玉喇叭形饰(M16:41)

在祭坛一层的表面，发现3处祭祀坑和4处积石圈。祭祀坑均为长方形，坑壁和坑底用小鹅卵石和黏土搅拌铺成，较平整，与祭坛表面浑为一体，显然是

与祭坛一层同时完成的。在1号祭坑内发现泥质灰陶豆2件、夹砂灰陶盆1件和夹砂红陶器盖1件，并出土一小段较细的禽骨，当为祭祀所用之物。积石圈均用石块围成一圈，与祭坛表面区别明显。除上述迹象外，还有若干块无明显分布规律的大石块散布于祭坛表面，其用途有待探讨。

在祭坛东南角有一片面积约40平方米的红烧土遗迹，叠压在祭坛二层之上，与祭坛一层相邻但无叠压打破关系，中间包含有较多的红烧土块或颗粒，发现1



凌家滩墓地发掘现场



祭坛南部发掘现场

件用石头琢磨而成的制品，腹部扁圆，腹上有一头斜向伸出，颇似龟的形态。该器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并且红烧土遗迹的局部地方土质较软，颜色较灰暗，看似经长期焚烧所致。这些情况反映出该遗迹应与祭坛有密切的关系。

发现的44座墓葬绝大多数为南北向，从随葬器物摆放位置看，头向应朝南。墓长一般2米左右，最大的4号墓长2.75、宽1.4、深0.3米。44座墓中有27座分布于祭坛外的西、南两侧，16座墓分布于祭坛之上打破或部分打破祭坛一层，仅1座位于祭坛北外侧。祭坛最南端有3座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和石器、陶器。4号墓出土随葬品131件、玉器96件、石器27件、陶器8件。29号墓出土随葬品80件、玉器51件、石器17件、陶器9件。有21座墓葬集中分布在祭坛正西的外侧，这批墓葬的随葬品以石器为主，玉器和陶器次之。玉、石器中以斧、铲最引人注目。有些墓葬较多地随葬玉(石)芯和加工后的碎玉料。在20号墓中，出土玉(石)芯111个。打破祭坛的墓葬，绝大多数以陶器为主要随葬品，玉、石器甚少，表明墓主已有身份、地位、等级方面的差异。


玉钺(M20:09)


玛瑙斧(M28:21)


玉齿环(T11②:09)

随葬品中大批精美的玉器有玉人、龙、璜、双虎璜、龟背与腹甲、镯、宝塔形饰、蝉形饰、三角形片、猪、勺、璧、圭形饰、管、扣形饰、月牙形饰、鹰(刻划有圆圈和八角星图)、斧、铲、环、钺、龙凤璜、齿环、玦、戈、喇叭形饰及水晶耳铛等。

凌家滩出土的玉人，以浅浮雕技法制成，体态比例匀称，是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体玉雕像。长方形玉片出土时夹在玉龟背甲和腹甲之间，长约11.4、宽8.3、厚0.7厘米，所刻图案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16号墓出土1件环形玉龙，直径4.2厘米，首尾相连，头上两角清晰可辨，身上阴刻细线，近尾部钻有一小孔，应属系挂之用。29号墓出土的1件玉鹰，双翅展开，鹰头侧向一面。展翅的鹰翼雕刻似一动物头，鹰身腹部刻有很规整的圆圈，圆圈内刻八角星图案。16号墓出土1件玉喇叭形饰，切割得极为规整，厚度仅有0.1厘米。




玉龙凤璜(M9:18)



玉璜(T0807③:8)



水晶耳铛(M15:34)



石钻(M23:6)

石钻出于23号墓，长6.4厘米，呈扁平状，一头宽一头窄，较宽的顶部有一直径0.6、长0.2厘米的钻头；与钻头连接的石柄上有数道旋转磨擦的痕迹。较窄的一端顶部有一直径0.1、长0.4厘米的螺丝钉形的钻头，钻头磨损较严重。石钻出土时与1件褐红色砂岩砺石放在一起，砺石正面已磨成凹形，这应是一组石质加工工具。

随葬石器磨制精致，种类繁多，大多没有使用痕迹，应是礼仪用器。随葬陶器质地疏松，火候较低，种类有豆形壶、鸡形壶、三足细颈鬶、细高柄大镂孔喇叭形圈足豆、高颈折腹平底壶、假圈足筒形杯、三高足浅腹鼎、圈足盘、细高柄杯等，代表了巢湖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凌家滩出土的玉器在造型构思、工艺技术等方面都表现了独特的风格，加工大致运用了切、割、凿、挖、钻、雕、磨、抛光等技术，大多用阴线刻，部分运用浅浮雕、半圆雕的技巧。玉器钻孔技术也特别发达，有对钻，背面斜钻，从侧面对钻、斜钻和直角对钻，有些在器物的正面见不到孔眼，可显示正面图案和造型布局的完整美观。

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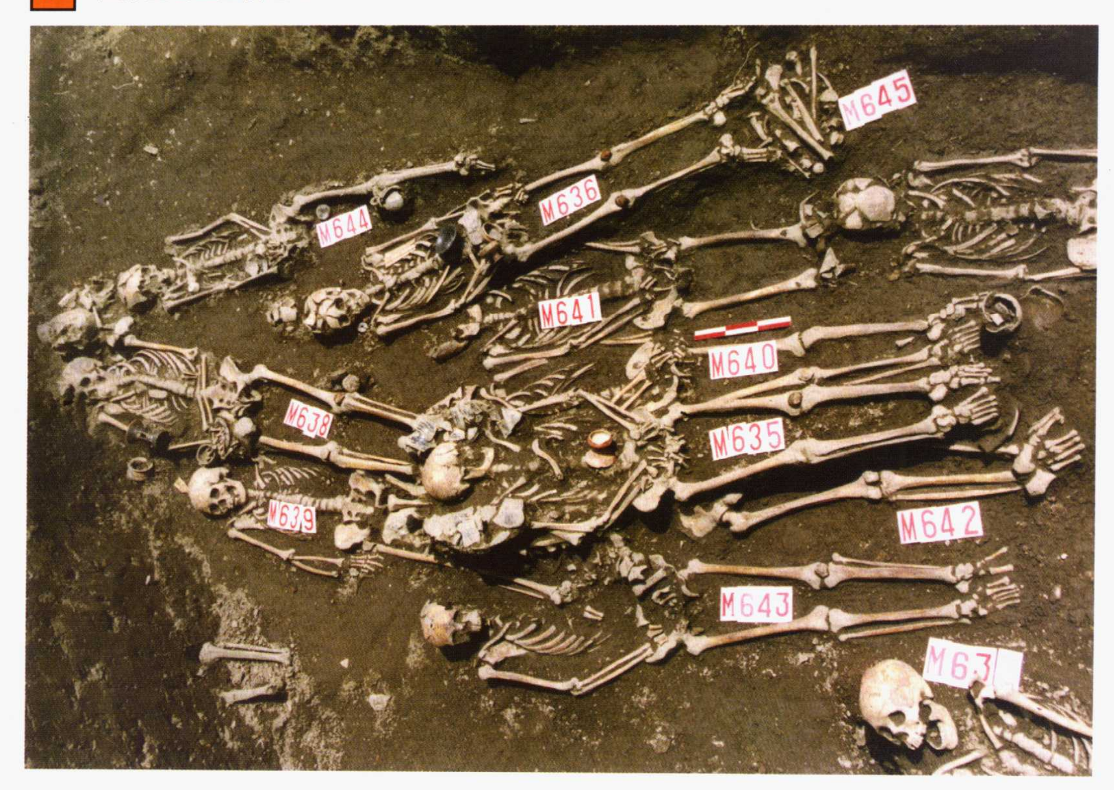


三星村遗址远景(自北向南摄)

三星村遗址位于江苏省金坛市西岗镇三星村，1985年省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并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一处较重要的遗址。遗址现存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其中心墓区约2万平方米。遗址现呈低矮的圆台形，高出四周地表0.5～1.5米。1993～1998年5月，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金坛三星村遗址连续6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面积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墓葬1001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

清理的1001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墓葬的头向均朝东北，仅极少数几座墓的头向例外。长方形竖穴式土坑墓占有一定的比例，另外多为无坑或无法辨别墓坑的墓。墓坑较小，仅能容纳尸体，深0.3～0.5米左右。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另有俯身葬、侧身屈肢葬、双人合葬、瓮棺葬、二次葬及二次迁葬与一次葬合葬等多种。各墓随葬品数量不等，一般5～6件，个别多达10余件或20余件，另有一部分墓内无随葬品。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的石器、玉器及骨角牙蚌器等。夹砂陶鼎多置于头顶部，其余陶器和随葬品多置于腹部和骨盆处，玉器置于耳、胸和手腕部。

灰坑多分布在房址附近，多为圆形



部分墓葬



部分墓葬


石钺（木柄为复制）

直壁平底状，少数为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坑内填土松软，含有陶片。土经浮选和淘洗。在其中发现较多的炭化稻米颗粒，经初步鉴定全属人工栽培稻，从粒形上观察接近现代粳稻，但粒形较狭长细小，其年代为距今6500年。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其中骨角牙蚌器等出土数量较多且制作精良，有些骨器经精细钻刻或抛光，这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原始文化中为仅见。骨器常见器种有刀、锥、匕、环、簪、针和针筒、匙、刻纹板状器等，骨刀利用动物肢骨削磨加工而成，端刃锋利，把手处圆滑且钻


七孔石刀



M248



刻纹板状骨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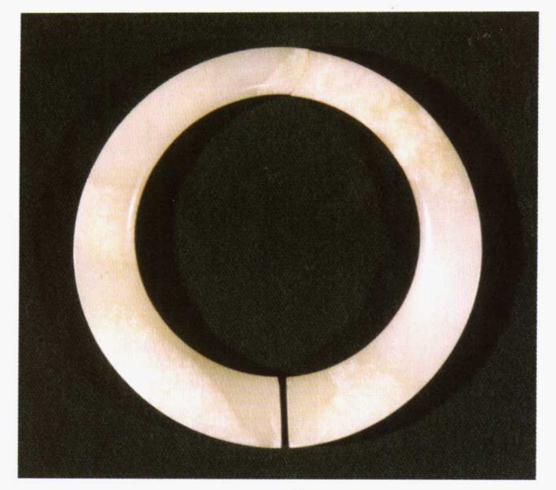
骨角器



石钺复原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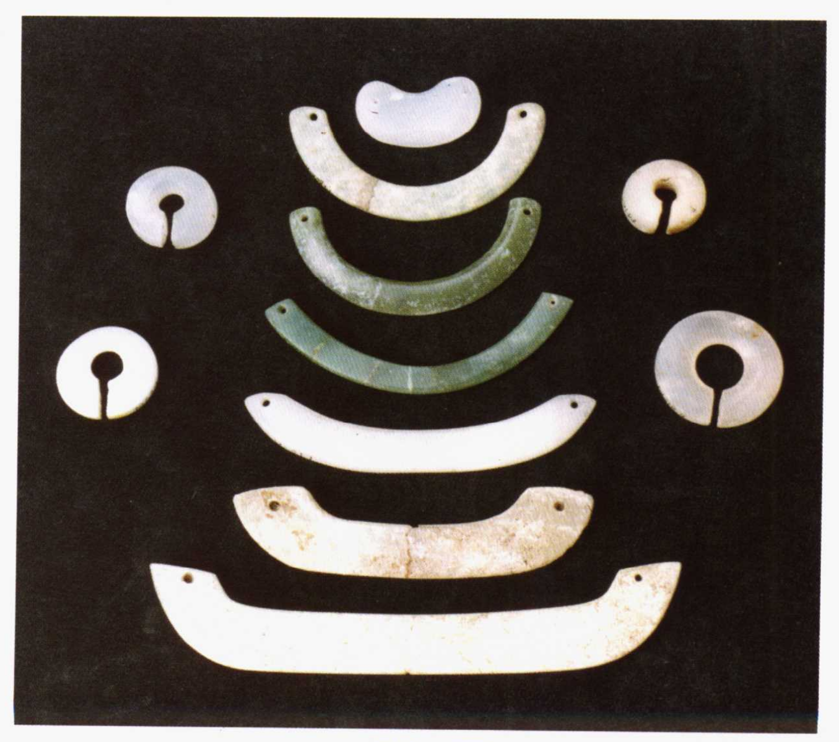
骨针、针筒与陶、石纺轮



玉 玦



鸟形黑陶壶



玉玦 、玉璜



人足形灰陶鼎



匜形黑陶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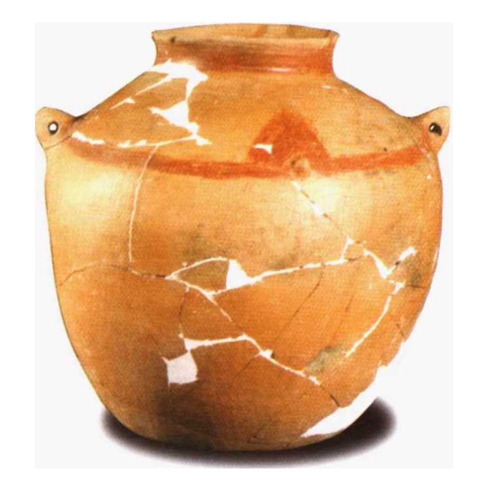


黑陶盉



带座灰陶罐

有孔眼便于系佩。簪有圆锥形和扁平弧线形，簪帽分半球形和宽扁形两种，其中扁平弧线形簪的帽部刻有工整规则对称的圆圈纹，通体抛光。刻纹骨筒数量较多，以动物肢骨切割制成，通体呈两端贯通的圆筒状，内外壁均经刮削打磨抛光，有的筒外壁刻印精细工整的几何形纹带，骨筒内还装有骨针。刻纹板状骨器是迄今国内首见之物，出于墓主人左侧胸部，共4片，每片正反两面均钻刻精细的花纹，片与片之间的花纹还存在相互联系和对称的关系，据分析此器很可能与原始巫术、宗教、卜筮等有关。另外还出较多的鹿角靴形器、鹿角锥、象牙簪、象牙柱形器、蚌镰、蚌串饰等，其中鹿角靴形器是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中较为常见的器种，此次出土近百件，常成对出于死者脚拇指上，钩尖朝上。靴形器上对称的孔眼是为



彩陶罐



刻印云雷纹彩陶豆



多彩陶尊



刻纹尊

了便于系扎固定，常与之伴出的有骨梭和网坠等织网、捕鱼类工具，应属织补渔网的辅助工具之类。

玉器多为装饰品，常见器种有玦、璜、串饰等，其中一件玉玦直径达9厘米，是国内目前所见时代最早、器形最大的一件。石器器形小巧、形制规整、磨制光滑，常见器种有锛、穿孔斧、七孔刀、三孔刀、锄、轮、纺轮、砺石、石料及钺等。大石轮呈圆盘状，厚硕笨重，通体磨光，中部有一穿孔，这种石轮当是在其中部孔内安装木轴，利用石轮转动重力形成的惯性来带动加工玉器、石器的工具。七孔石刀与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出土的七孔石刀完全一致，金坛三星村遗址发现的七孔石刀应是目前所见七孔石刀分布的最东缘。出土的石钺无使用痕迹，装饰豪华考究，应属礼器。



带把红陶壶及壶底模印徽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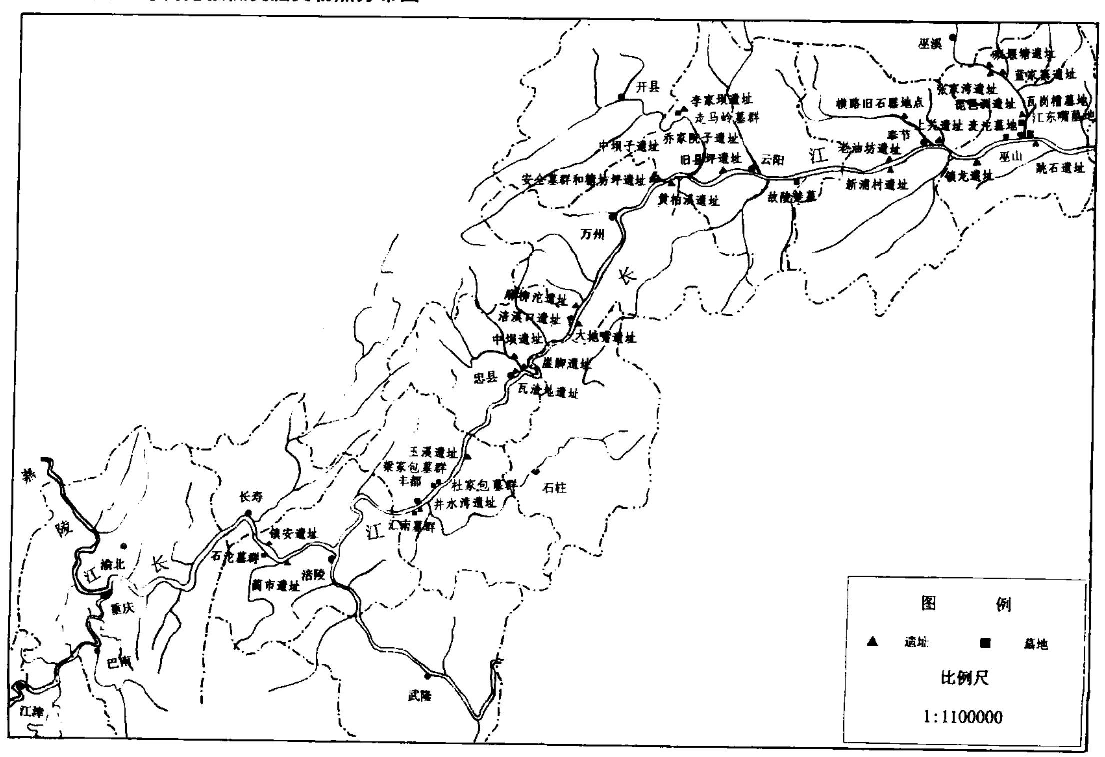
陶器烧制火候高、质地坚硬、器形矮小、形制规整，具有独特的风格。陶质以泥质红陶和灰陶为主，另有夹砂红陶和灰陶及泥质红衣彩陶等。常见器种有鼎、甑、豆、罐、盆、钵、杯、盘、盉、匜、尊、纺轮、弹丸及陶猪等，其中鼎出土数量较多，可以分为釜形鼎、罐形鼎、盆形鼎等几种，其中一件人足形罐形鼎较为特殊。匜类器出土少而精，器表多经打磨抛光，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其中的匜形豆为国内首见。圈足类陶器足部常有规则的镂孔，孔眼有圆形、三角形、蝌蚪形及长条形多种，在其他同时代的遗址中比较少见。出土的刻印云雷纹彩陶豆更是精美，是目前发现的同类纹饰中最早的例证。另外出土的镂孔尊、组合式豆、鸟形壶、抛光多彩尊等都是少有的珍品，反映出三星村原始文化高超的制陶水平。

重庆市三峡工程库区考古



李家坝98IF5出土封泥

三峡库区考古抢救性发掘文物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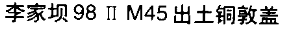


▶ Archaeological Work in the Area of the Sanxia Gorge Reservois Near Chongqing

□ 1998年度，重庆市三峡工程库区考古发掘共涉及7个区县的36处古遗址、古墓葬，总计发掘面积24790平方米。

在丰都井水湾遗址发现了与高家镇遗址时代相当的、三峡库区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出土动物化石及石制品100余件，包括石核、石片、石锤、石球、砍砸器、刮削器等，其埋藏情况与华南地区露天旧石器遗址十分相似，考古学年代可能为旧石器时代中期。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相对集中于巫山锁龙，忠县中坝、瓦渣地等遗址，在认识重庆库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内涵、文化序列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收获。在哨棚嘴新石器文化最晚阶段出现了与川西宝墩村文化相似的因素，为探索峡江地区与川西平原原始文化关系、川西原始文化的起源等课题提供了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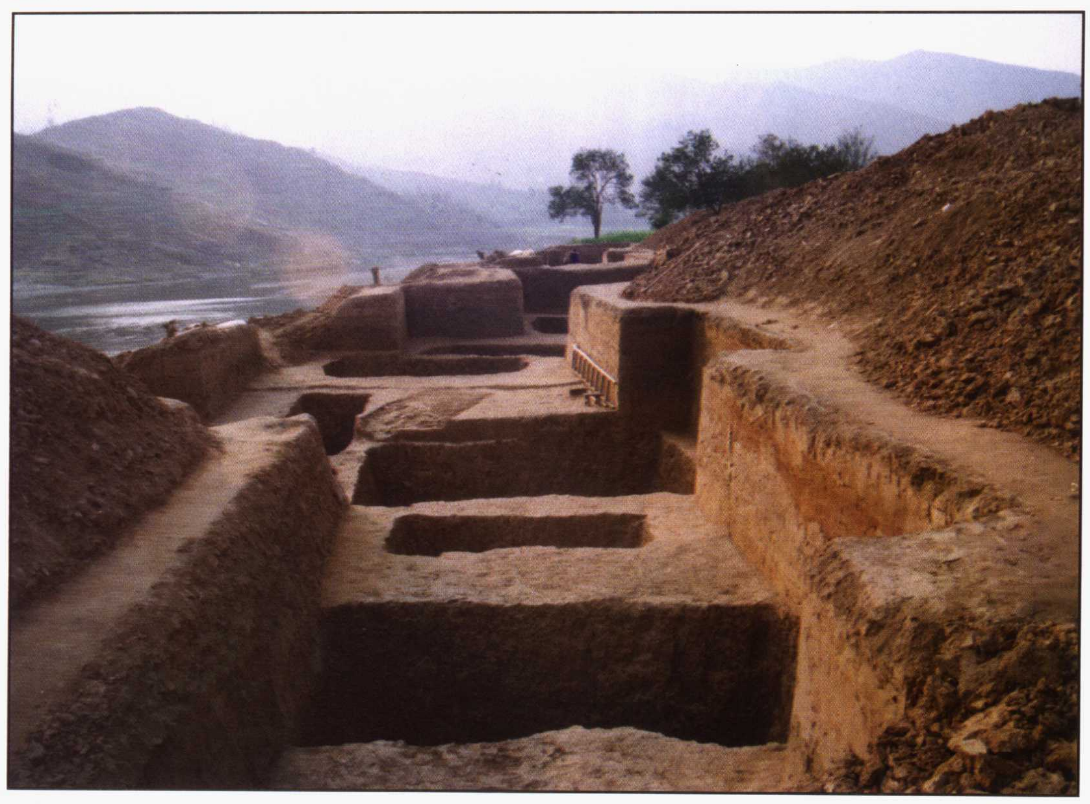

李家坝98 II M45出土铜敦盖

在中坝遗址II区首次发现有明确层位关系的三星堆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对于建立重庆峡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的年代序列有重要的意义。

战国时期墓葬的发现是本年度最突出的收获之一。在涪陵蔺市、忠县崖脚、万州中坝子、云阳乔家院子和李家坝、奉节上关、巫山麦沱等地共发掘战国时期墓葬近100座。上关战国中晚期墓为典型楚式墓。其中M48长7、宽6、深7米多，规模之大为重庆库区所仅见。麦沱3座战国晚期墓葬的形制为典型的东周楚墓。蔺市战国墓葬则属典型的巴人墓。李家坝以战国晚期为主的45座墓葬，随葬的器

中坝遗址全景(自北向南摄)





李家坝遗址Ⅱ区1998年发掘情况



中坝遗址发现的9号龙窑(自西南向东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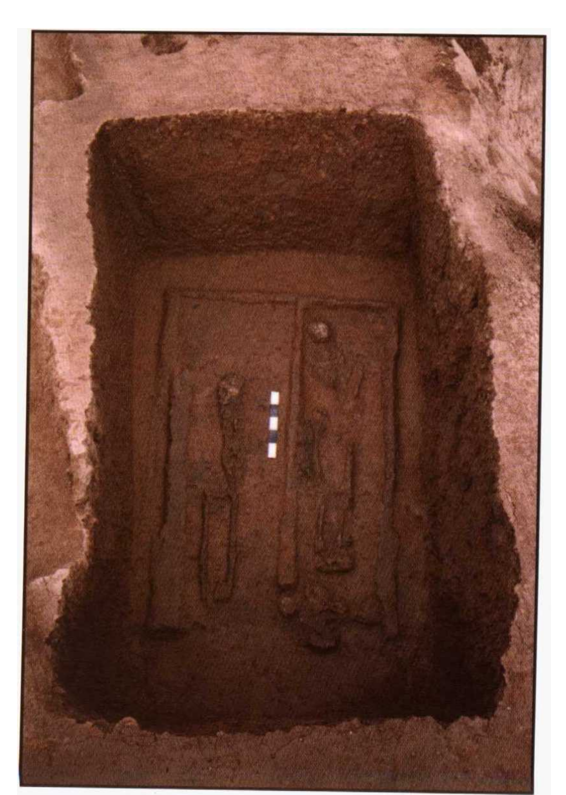


中坝遗址发现的3号龙窑(自西南向东北摄)


李家坝 98 Ⅱ H30 出土尖底杯

物兼有巴蜀文化、楚越文化及融合型数种，如带格剑、楚式矛、楚式鼎、越式鼎、不对称形钺等，显示出墓地多种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

在崖脚墓地共发掘楚墓15座，大致属战国中期，是已发现典型战国楚墓的最西界；巴人墓2座，时代为战国时期至秦代前后，为研究巴、楚、秦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此外，D区M11随葬楚式凹圜底陶罐、铜剑、巴式短骹弓耳矛、越式靴形钺，包含了三种文化因素，颇具李家坝墓地类似的文化融合特征。


李家坝 98 Ⅱ M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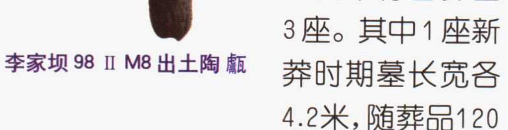

李家坝 98 Ⅱ M45


李家坝98 Ⅱ M20出土陶豆


李家坝98 Ⅱ M10出土陶圜底罐


李家坝98 Ⅱ M23出土铜鋬

西汉至东汉初土坑墓在丰都镇江杜家包及汇南、忠县崖脚、巫山麦沱墓地皆有发现。在汇南发现的1座带斜坡墓道、墓室中部铺花纹砖、棺台和墓道以石块封砌的土坑墓，形制较为少见。在崖脚墓地清理西汉土坑墓2座、王莽至东汉早期土坑木椁合葬墓3座。其中1座新莽时期墓长宽各4.2米，随葬品120余件(组)，随葬品中的陶釜与战国晚期巴人墓中的陶釜有继承性，可能为汉代巴人遗存。


李家坝98 Ⅱ M8出土陶甗

东汉墓以丰都汇南、中梁子、祠堂堡、梁家包、杜家包，巫山江东嘴、双堰塘、麦沱墓地较为集中。麦沱墓地M47为东汉早期墓，砖室券顶带甬道，出土金、银、铜、釉陶、硬陶、泥质陶器近100件。较珍贵的有金银镯、金银指环、铜钟、簋、盆、鋬及鎏金铜棺饰，还有形制独特的单阙、朱雀、玄武等。


李家坝98 Ⅱ M8出土陶鬲

在崖脚墓地清理的一座南朝刘宋时期的刀形砖室墓(DM2)保存完好，出土

李家坝98 Ⅱ M45出土铜匕


李家坝98 Ⅱ M45出土铜鼎


李家坝98 Ⅱ M41出土铜戈

李家坝98 Ⅱ M45出土铜戈

李家坝98 Ⅱ M21出土铜戈

李家坝98 Ⅱ M9 出土铜剑

李家坝98 Ⅱ M40 出土铜剑

品中的20余枚铜币，最晚的为刘宋时期铸币，其中“两铢”、“景和”、“永光”币品相好，文字清晰。此外还有一枚反书的“两铢”钱。

在忠县中坝遗址继1997年度发现3座龙窑后，1999年又分别于Ⅰ区、Ⅱ区清理龙窑2座。窑址叠压在汉代地层下，为重庆库区及四川盆地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窑，且规模大，长约14米。

重庆峡江地区通过正式发掘的唐墓，过去仅有万州冉仁才墓、云阳明月坝墓2座，本次在上关清理19座唐墓，其形制有两种：一种为狭长方形砖室券顶墓，墓砖为饰绳纹的长方形砖；另一种为横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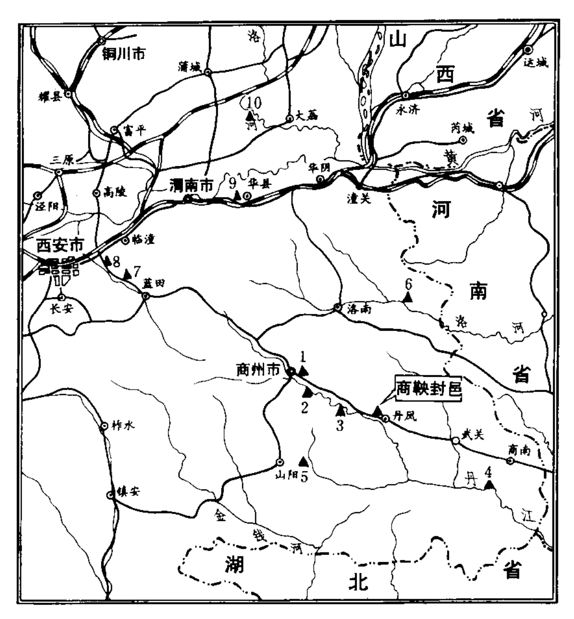


1. 李家坝98 Ⅱ M15出土铜矛
2. 李家坝98 Ⅱ M14出土铜矛
3. 李家坝98 Ⅱ M12出土铜矛
4. 李家坝98 Ⅱ M45出土铜矛

土洞墓，有墓道和墓室，墓道一端通常以石封口，墓室内靠近墓道一端放置随葬器物，内侧葬人，规格高一点的墓底铺有一层砖。盘口四系壶、罐为两种最基本的随葬品。

在中坝遗址Ⅰ区清理元代窖藏一个，出土龙泉窑、乐山西坝黑釉瓷108件。龙泉窑瓷器有粉青、豆青、梅子青釉等，器种有印花碟、盘、碗、盏、匜、玉壶春瓶等。乐山西坝黑釉瓷以碗、碟为主。

1.商州东龙山遗址
2.商州紫荆遗址
3.丹凤巩家湾遗址
4.商南过凤楼遗址
5.山阳鹃岭楚墓
6.洛阳龙头梁遗址
7.蓝田泄湖遗址
8.西安老牛坡遗址
9.华县南沙遗址
10.大荔梁家坡遗址



陕西商州东龙山遗址

□ 东龙山遗址位于丹江之阳二级阶地上，与紫荆遗址隔河相望。遗址分布范围东西长约1000、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20多万平方米。遗址内涵丰富，文化堆积时间长，包括有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商文化和周代文化等各时期遗存。1997年5～8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商洛地区文管会联合对商州市东龙山遗址进行首次抢救性发掘。1998年3～6月，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二次正式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面积约1000平方米，发现一批属于上述文化的房址、灰坑和墓葬，出土了大量文化遗物。

龙山文化灰坑 I 个，皆呈圆形袋状。在其中一个坑的底部还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动物骨架。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石斧等生产工具。陶器多为灰、黑色，但也有极少数量红陶。纹饰以绳纹最多，篮纹次之，其他纹饰较少。器类主要有直领单把绳纹鬲、敛口直腹堆纹斝、鬶、豆、侈口鼓腹篮纹罐、高领双耳鼓腹罐、喇叭口罐、花边口罐、单耳小罐、大口双耳杯、小口瓮以及器盖等。不难看出，该遗存与关中地区的客省庄文化具有较密切的文化联系，其在陶器方面的共同特征尤为突出。如鬲、斝、鬶、罐以及双耳杯等器物均基本相同，说明这一遗存应



发掘区局部

与客省庄文化属同一文化，但也能看出一些地域性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时期灰坑21个，墓葬14座。灰坑以圆形、椭圆形为主，也有少量长方形或不规则形。出土遗物颇为丰富，包括生产工具、日用陶器以及装饰品等，此外还有较多数量的卜骨和兽骨等。工具中以长方形穿孔石刀和石斧发现最多，并有骨锥、骨镞以及陶质纺轮等器物。日用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灰(黑)陶为主，泥质和夹砂红褐陶次之。除表面光素者外，各种纹饰中以绳纹最为流行，此外还有附加堆纹、篮纹、方格纹、弦纹、圆圈纹、回形纹等。在有些器物上，还发现刻划符号与动物形刻画。器类主要有鼎、鬲、尊、豆、盘、盆、甑、罐、瓮、缸、盖等，并有为数不多的盉、罍、觚和小陶杯。装饰品中有较多数量的骨笄，多磨制精细。卜骨则不加整治，大都只有灼痕，只有极少有钻。兽骨不仅出土数量较大，其中所包含的动物种属也较多。14座墓葬包括6座小型土坑墓和6座灰坑葬，另有2座小孩瓮棺葬。成人墓以仰身直肢葬居多，也有俯身直肢或侧身屈肢等不同葬式。未见葬具痕迹，除1座随葬陶器外其余均无任何随葬品。小孩瓮棺葬以深腹罐和大口鼓腹罐作为葬具。

东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遗存的文化面貌和总体特征，与伊洛地区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其年代大体相



商代石磬



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M7)



商代墓葬(M21、M20)



二里头文化时期陶鬲



二里头文化时期陶器(H18 出土)



商代陶器(M22 出土)


龙山时期陶鬲


商代陶鬲

当于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或许略早一些。

商代二里岗期文化遗存最为丰富，遗迹包括房址 2 座、灰坑 61 个、墓葬 16 座。房址为方形地面建筑，灰坑多圆形和长方形，墓葬皆小型土坑葬，半数墓中放置陶器等随葬物品。所出遗物以陶器为大宗，陶系以泥质和夹砂为主，纹饰以绳纹最多，并有附加堆纹、菱形方格纹、方格乳钉纹、云雷纹、饕餮纹、圆圈纹等。器类以鬲、簋、尊、豆、盆、甑、罐、瓮、缸、盖最为常见，也有为数不多的壶、罍、盉、甗、圜底钵和小陶杯。陶鬲的数量较多。同类器物形制复杂多样，且早晚变化明显。铜器仅为一些小件工具或小型铜牌、铜环、铜镞等，在遗址发现的铜炼渣等现象说明当地曾有青铜冶铸。遗址内还发现各类石质、骨质和陶质工具等。卜骨亦发现较多，用料多为牛肩胛骨，也有极少数量为羊肩胛骨。背面多经整治，多数有钻有灼，少量仅见灼痕。兽骨数量较大，种属亦颇复杂。

通过初步研究和遗址层位关系及出土器物特征分析，东龙山商代遗存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两期年代分别相当于



商代陶器(M21 出土)


西周陶鬲

郑州二里岗下层偏晚阶段和二里岗上层时期。

周代遗存发现较少，有灰坑2座，遗物主要是陶器，且以鬲、盆、豆、罐为主，时代相当于西周中晚期。值得注意的是，周代陶器既有周文化因素，又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如红褐色柱足联裆鬲颇具楚式风格，当与早期楚文化存在密切关系。

东龙山遗址的发掘，对研究秦岭南麓丹江上游地区的史前到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以及各阶段的文化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线索，为进一步研究夏商时期中原地区与西南地区的文化关系创造了条件。



商代卜骨



铜"析子孙"方鼎（M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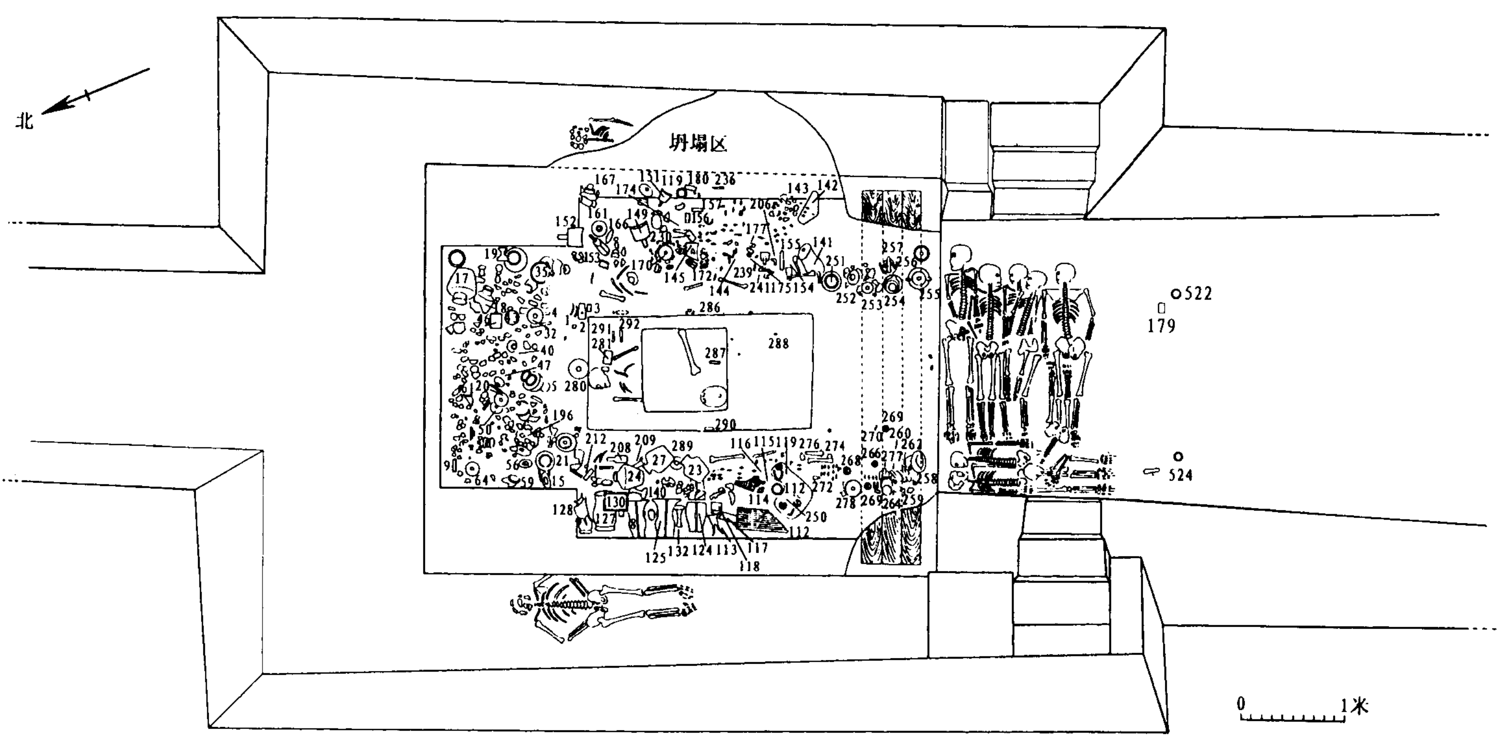
河南鹿邑商周墓葬

□ 1997年，由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鹿邑县太清宫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距遗址西约500米处发现一座商末周初的中字形长氏贵族大墓，经发掘，出土大批精美的铜器、玉器、陶瓷器等，并发现目前我国最早的禽骨排箫，对研究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的关系及豫东古文化发展序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墓是一座有南北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大墓，长47.5、宽7.5米。墓内葬具为一椁一棺，在墓室内共清理出随葬的人骨架13具、狗骨架1具。随葬的人骨架经初步鉴定，椁室之南多为儿童，棺两侧二层台上为女性，腰坑内为男性。

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遗物，其中铜容器79件、兵器及工具20余件、玉器99余件、青铜乐器6件，陶瓷器100余件，各种质地的遗物总数达400余件，加上大量贝币、骨镞等可达千余件。在青铜器的组合中，以酒器为最多。酒器类有爵、觚、斝、卣、觥、觯、尊、角、罍等，食器计有鼎、簋、盘、鬲、甗、盉，其中方形器较多，有方鼎、方尊、方罍、方觚、方斝等。纹饰有饕餮纹、重环纹、龙纹等。较大型铜器一般有三层纹饰。在鼎、罍、爵、觥、斝等的器盖与腹部发现有铭文，如"长子"、"长子口"、"戈丁"等，其中以"长子口"为最多。

墓内出土玉器数量较多，有戈、刀等仪仗用具，也有璧、环、璜、玦、柄形器、条形玉等礼玉和佩饰，以及牛、虎、鹿、鸟等动物形玉雕。在铜斝内发现的圆雕玉虎，作踞坐式，背面雕刻成枭的形象，



图二　M1平面图

1.牙器　2、3.玉器　4、133.铜爵　5、9、43、46.铜鼎　8.铜尊　15.铜觯　17、18、21、23、24、27、32、35、39、40、47、50、59、61、64、161、167、170、251～256、258、259.陶罐　19.陶豆　56.陶器　112～116.骨排箫　117.铜梭背大刀　118、132.铜觚　119.铜"U"形钉齿器　124.铜罍　125.铜方尊　127.铜圆尊　128.陶爵　140.陶豆　141、264.陶壶　142.石磬　143.铜器　144.铜承弓器　145、149～153、166.铜铙　154.铜铃　155、241、257、276.铜戈　156、157、180、230.铜锛　172.铜圆形钉齿器　174.铜马衔　175.骨泡　177、212、291.玉柄形器　179.铜车衡末饰　196.铜斝　206、208.铜刀　209.玉抄　236.铜凿　239.玉鱼　260、262、277.铜铲　266、268、269.铜泡　272.骨镞　274.石器　280.玉璧　286.玉钺　287～289.玉戈　290.玉璜　292.玉璜形饰　522.铜车軎　524.铜车饰（缺号者压在其他器物下）



铜“子”方鼎(M1:191)



铜“子口”扁足圆鼎(M1:43)



铜方尊(M1:125)





铜"长子口"方罍
(M1:124)及铭文拓片



铜簋形觥(M1:92)



铜觥(M1: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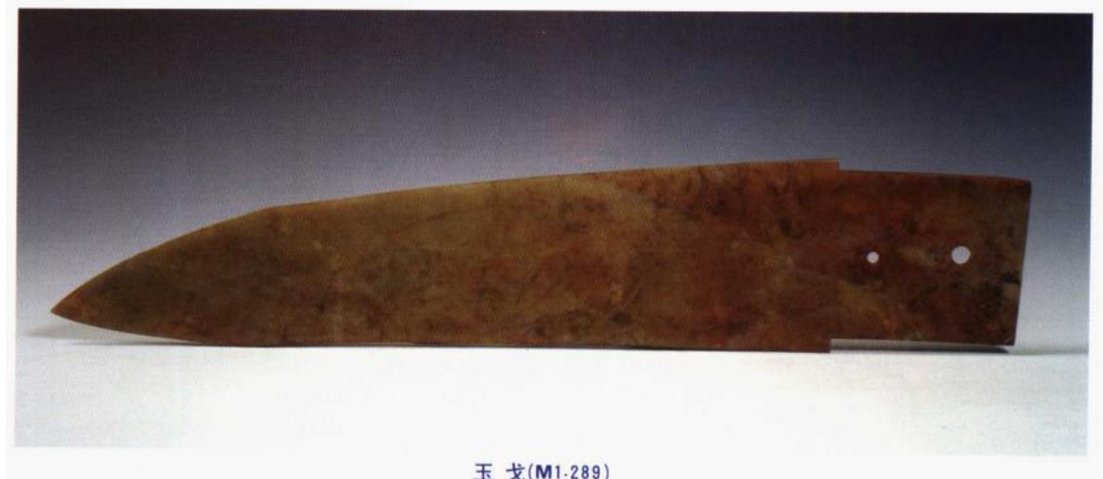


铜“长子口”方斝（M1:222）



铜方爵(M1:133)


墨玉刀(M1:330)


玉 戈(M1:289)

造型生动，雕刻精细，为玉器中的精品。

墓葬中还发现一批较精致的原始瓷器，有尊、罐、豆等，从釉色、胎质等方面看，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之郑州出土的商代早期瓷器更趋于成熟。出土的陶器数量较多，计100多件，主要有罐、簋、盆、豆、爵、壶、尊等，以罐、罍为大宗。器物一般带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不见商、西周时期流行的鬲、甗等三足器，显示出其独特的地方特征。

墓内出土的乐器，有石磬1件、铜铙6件、骨排箫5组。6件铜铙以形制和花纹的不同可分为两组，每组大小依次递减。禽骨排箫保存较好的有两组，每组13根，最长者21.7厘米，箫下部长度依次递减，管身有两道以绳带束管的痕迹。其他散乱的骨管尚有40余根，根据骨管的排列推测至少有5组。它们比春秋中期的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的石排箫和战国初期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竹排箫时代更早，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排箫实物。

从墓内出土的青铜器铭文分析，其墓主人应是“长子口”。长氏与商王朝关系密切，甲骨卜辞中记载长氏曾向商王贡龟。以往发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又证实长氏在周时归服于周。太清宫一带商周时属厉，长子口可能是派往厉地驻扎的高级贵族。墓葬形制等级较高，为仅次于国王亞字形墓一级的中字形墓。安阳殷墟仅发现9座中字形墓。西周时代，只



玉 簋(M1:74)



玉 璜(M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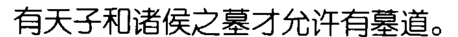




玉虎形踞坐人(M1: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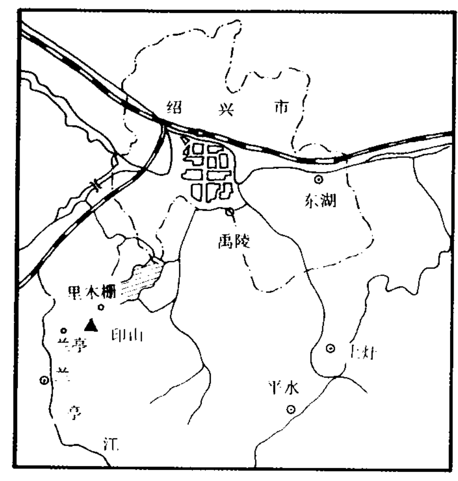
玉虎形踞坐人背面(M1:367)



有天子和诸侯之墓才允许有墓道。

长子口墓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商代墓葬使用腰坑较为普遍，周人使用较少。出土青铜器仍保存商文化的造型与纹饰，如圆鼎、斝、方鼎、觚、爵、方罍的形制及纹饰，与殷墟晚期的同类器物相近。而且礼器中酒器比较多，也有食器，属从商代重酒组合向周代重食组合转变的过渡阶段。从总的风格上看，陶器豫东地区地方特点突出，与殷墟陶器有所区别，既有西周初年的特点，也有商文化的因素。墓内有殉人13个，分别随葬于棺前、棺左右及两侧二层台上，腰坑中随葬有受刖刑而被砍掉下肢的奴隶，这种殉人较多的习俗，也属商文化的特点。通过对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铜器器形及组合等方面综合分析，该墓应为殷人之墓，其时代为商末周初。

浙江绍兴
印山东周越国王陵



印山大墓位置示意图

墓地环境远眺



▶ *Royal Tombs of the Yue State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at Yinshan, Shaoxing, Zhejiang*

□ 印山大墓坐落在绍兴县兰亭镇里木栅村南的印山之巅。该墓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已被发现。1996年春，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参加，于1996年9月至1998年4月对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发掘结果表明，这是一座带宽大长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岩坑木室墓，墓上建有巨大的封土墩。印山四周外围还设有隍壕围护，整个墓地占地面积达85000平方米，规模宏大。

玉 镇

大墓的墓穴从山顶岩层中挖凿而成，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在营建过程中，南面坑壁有坍塌现象，形状不规整。现存坑口长46、最宽处19、最狭处约14米，坑底长42.5、宽12、坑深约12.4米，四壁均不设台阶。墓道设在墓穴东壁正中，与墓穴连接共同构成甲字形的平面布局，墓道底面略向墓道口倾斜，上口宽6.5～14、底宽3.7～8.7、全长5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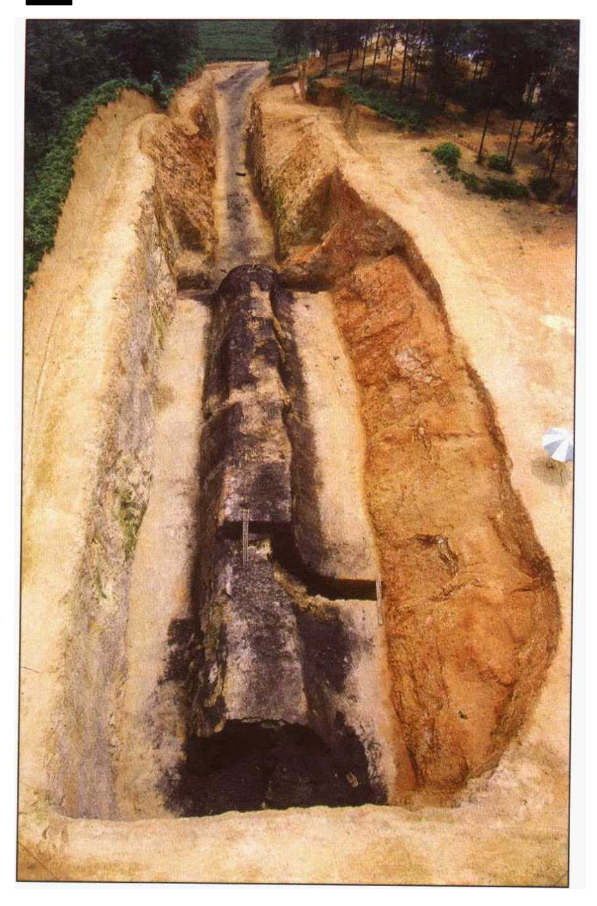
墓室用巨大枋木构筑，呈狭长条两面斜坡状，横断面呈三角形，现存结构大体完整。其构筑方法是：先用枋木横向平铺出墓室底面，再在底面两边用枋木紧密排列互相斜撑而成，顶部压盖大体呈半圆形的厚木。墓室规模巨大，内长33.4、外长34.8、内底宽4.78～4.88、外底宽6.7、现存室内高度4.7米，复原高度在5米左右。内分前、中、后三室，各室之间设有门槛，门槛上方有门梁，从现存迹象分析，原先在门槛与门梁之间设有木板隔墙，三室的底面略有高差。构筑墓室的底木长6.7、截面长0.55～0.8、宽0.4～0.75米；两侧斜撑木长5.9、截面长0.6～0.75、宽0.5～0.8米。这些巨大枋木加工极其规整平直，构筑整齐合缝，室内壁面与底面均平整光洁，显示出高超的木材加工技术和构筑技术。同时，这些枋木均三面髹漆，表明当时是将加工好的木料先髹漆后再构筑墓室的，墓室内局部地方至今漆面如镜，令人叹为观止。在未髹漆的斜撑木外侧面，大部分挖凿有5组牛鼻式孔，便于搬运和构筑时穿绳之用。

墓室之前设有残长2.5米的甬道，甬道连接墓道。甬道亦用枋木两面斜撑而成，呈两面斜坡状，但无平铺的底木，其顶端高度也低于墓室。

木棺置于中室，系一大型独木棺，它是用巨大的原木一剖为二后挖空而成，一半作棺身，另一半作盖。棺长6.04、宽1.12、内高0.4米，内外髹漆。棺下横垫有3根小枋木。发掘时，棺盖已被打破，一部分翻落地下。棺内尸骨无存。



青铜铎



该墓不但规模宏大，墓室豪华，而且填筑也十分讲究，防水、防腐措施做得十分严密和科学。在构筑墓室之前，先将整个巨大的坑底全部铺垫一层厚1.65米的木炭，墓室建于其上。墓室建成后，又先在其外包护约140层树皮，树皮外再填筑约1米厚木炭，然后，整个墓穴再全部用青膏泥分层填筑至高出坑口1米，最后在墓上堆筑巨大的封土墩，把整个墓穴和一部分墓道覆盖住。封土墩长径72、短径约36、中心高近10米，均分层版筑而成。夯层坚实清晰，每层厚7~9厘米，夯面板结平整，极易剥揭。圆形夯窝，直径约7厘米，清晰可见。这些填筑方法和措施，对墓室的防腐保护极为有利。

该墓早年盗扰严重，共发现7个古代盗洞，其最大者开口直径达 8 米左

墓葬全景（自西向东摄）

中室独木棺出土状况（自东向西摄）





墓坑及墓室（自东向西摄）



墓室内部（自东向西摄）



木质夯具出土情况

右。这些盗洞顺着墓坑走向一字排列，全部打破墓室进入室内，墓内随葬品基本无存，但在中室部位，仍出土玉剑、玉镞、玉镇、玉勾形器、长方形玉饰、微型玉管珠、石矛、矛柲、残漆木器等30多件遗物。这些遗物制作精良，玉器大多具有精美的卷云状花纹。玉剑出土时还保留一部分木质剑鞘。玉勾形器原应插于某种物体之上，很有可能是某种礼乐器的挂钩。微型玉管珠分别呈白色和黑色，其中玉珠小如油菜籽，借助放大镜可观察到两者都有穿孔。这些遗物可能都是死者的服饰品。除上述遗物外，中室底面上还发现铺垫编制十分精细的竹席。前室仅残留破碎的泥质陶器，后室除残碎的泥质陶器外，还发现1件石环和漆木器腐朽后的漆皮痕迹。另外，从墓坑青膏泥填土中，还出土铜铎1件和木质夯具3件，青铜铎不但铎体无损，而且木柄和木舌也完整地保存下来，实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墓内残留遗物和封土中出土的包含物，都反映出大墓的年代应该为春秋末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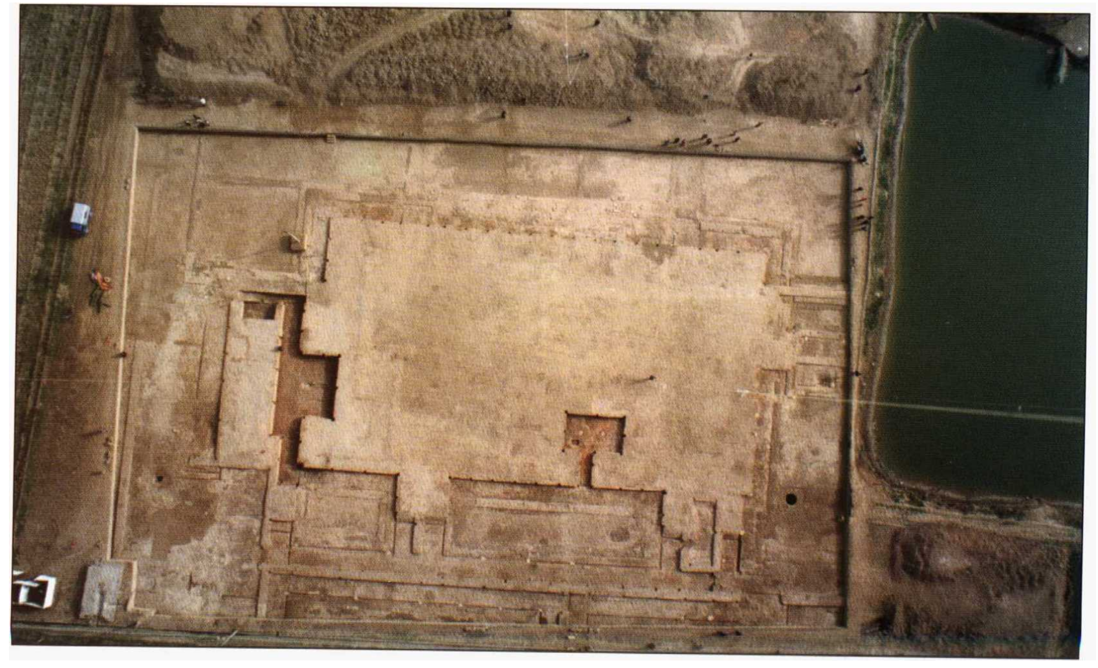
根据墓葬宏伟的规模、豪华的墓室、巨大的独木棺以及墓地四周有隍壕设施等方面分析，结合有关文献考证，印山大墓当为一座越国王陵，其墓主应为越王允常。

西安汉长安城
桂宫二号建筑遗址

□ 经国务院特别许可，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共同组成的中日联合考古队于1997年11月～1998年5月，对汉长安城桂宫二号建筑遗址进行了发掘。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夹城堡村东约200米，位于汉长安城桂宫遗址西南部。发掘范围东西长84、南北宽56米，面积达4704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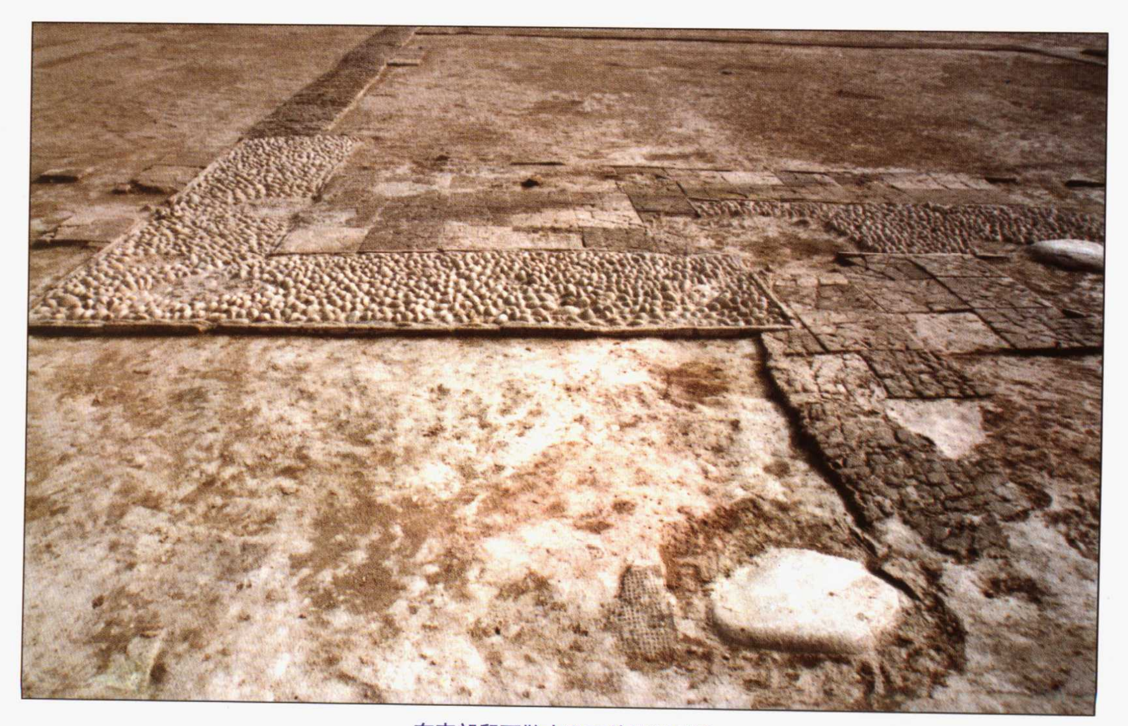
建筑遗址可分南、北两部分，二者间有东、西向夯土墙相隔，隔墙西部有一门道，门宽4.8、进深1.05米。此次发掘主要是南部遗址，南部遗址现存北墙和东墙，墙体夯筑，宽约1米。东墙已清理，长50.05米，北墙长67.2米。

主殿基址位于南部遗址中部，其东、西两侧有附属建筑遗迹，北面置庭院(编号一号院和二号院)，遗迹保存较好。



遗址全景


殿堂西散水（自南向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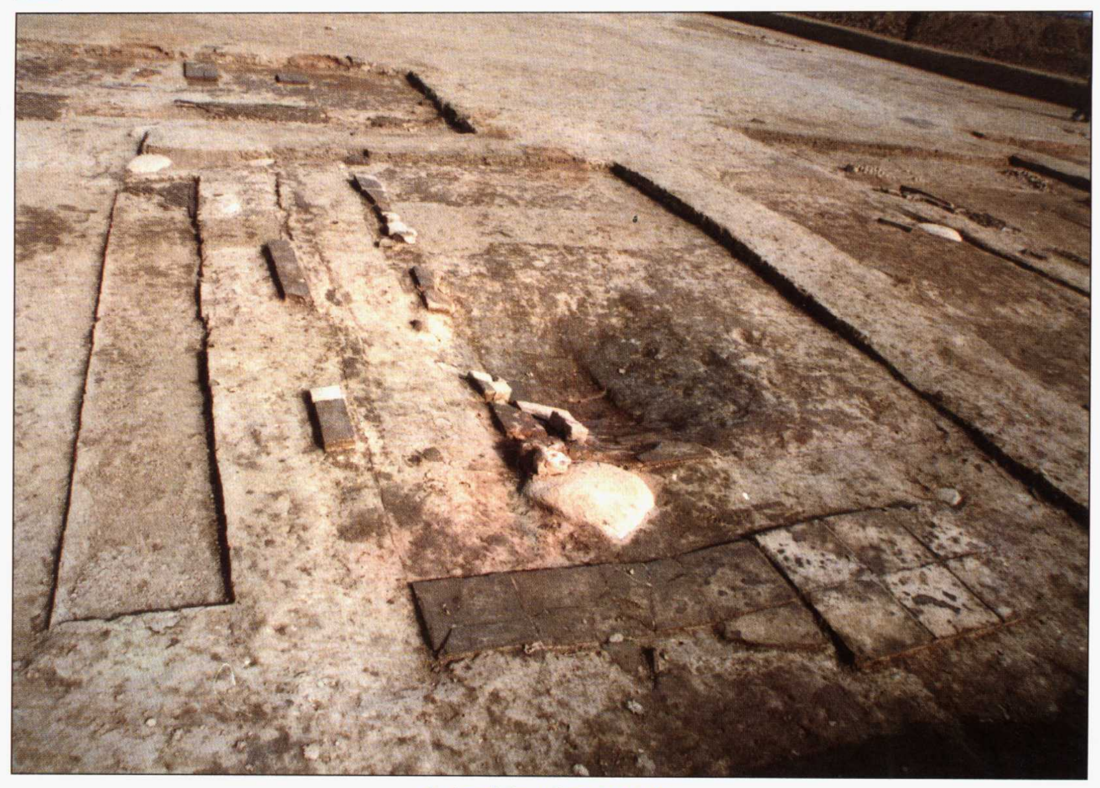

东南部卵石散水及瓦片砌就的路



地下通道南口、门房址（自东向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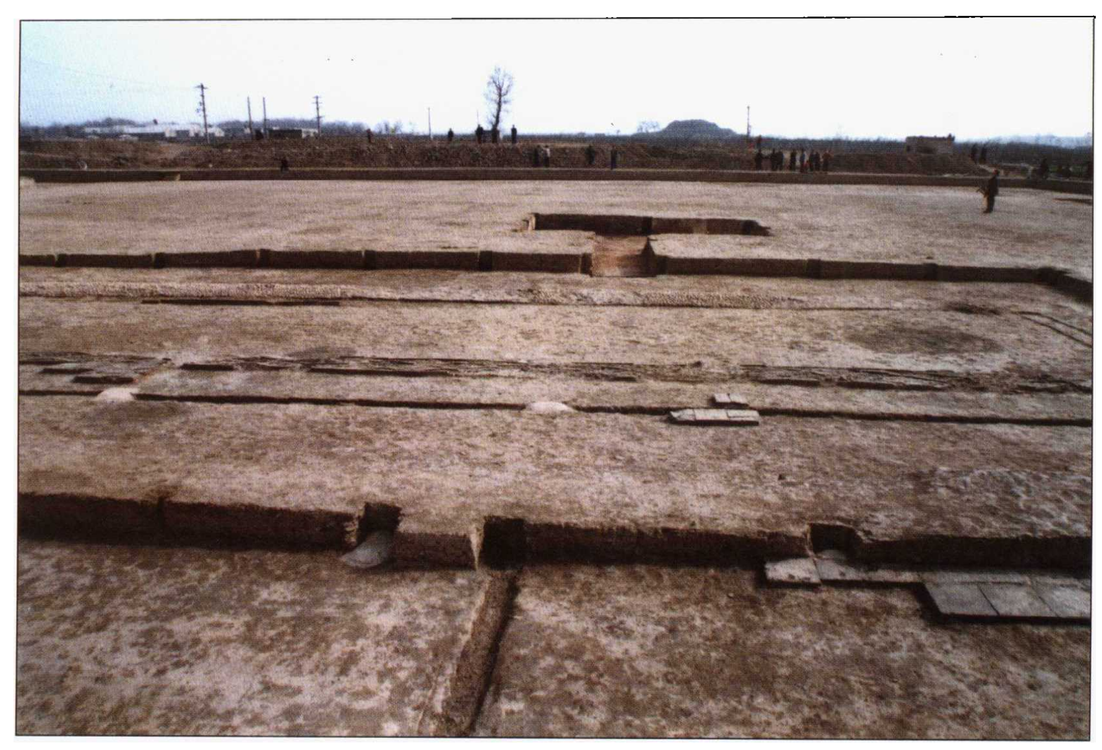
殿堂北部西通道（自北向南摄）



遗址西南部（自西向东摄）



殿堂北部庭院（自西向东摄）



殿堂北部庭院地下室（自北向南摄）

主殿台基夯筑，东西 51.1、南北 29、现存高 0.29～0.36 米。台基四壁有壁柱，其外环绕廊道和散水，散水之外置铺砖道。廊宽约 2 米，其上铺砖。廊道之外的散水宽约 1 米。除西廊外散水为瓦片砌就外，其余散水均为卵石铺装。散水外铺砖道宽度不一，窄者 0.45、宽者 0.9 米。

主殿台基南面设东、西二阶，基本对称分布于主殿南边，二者间距 28.5 米。二阶均由平道和坡道组成。

主殿台基西侧有院子(编号三号院)和房子(编号F4)各一座。三号院南北宽4.8、现存东西8.6米。其南北有廊及瓦片散水。院子中部为天井。天井南、北有回廊和瓦片散水，天井东有卵石散水，散水四周各铺一排素面砖。

F4 坐东朝西，面阔 2.5、进深 4.5 米。西墙南部辟门，门道面阔 0.7、进深 0.55 米。F4 西北部清理出一砖池遗迹。砖池上口东西 2.1、南北 1.5 米，底部东西 1、南北 0.7 米，池深 03 米。砖池四壁坡向池底。

F4 西侧为一南北向通道，长 4.3、宽 1.65 米。

主殿台基北面的两座院子东、西并列。两座院子布局结构相同，平面长方形，院子中部为天井，四周为回廊。廊道地面铺砖，砖外置散水。

一号院位于主殿台基北面的西部，东西 24.5、南北 8.9 米。中部天井东西 20.4、南北 3.4 米。东、西廊各长 8.9、宽约 1 米。南、北廊各长约 24、宽分别为 2.1 和 1 米。南廊和西廊外之散水均为卵石铺装，散水外铺置一排与之平行的素面砖。东廊和北廊外之散水均为瓦片砌就，二廊散水长分别为 5.8 与 20.7、宽约 1 米。

二号院位于一号院东面，东西 11.2、南北 8.9 米。中部天井东西 7.3、南北 4.1 米。南、北廊各长 11.2、宽分别为 2.1 与



遗址发掘情况（自西北向东南摄）

0.95米。东、西廊长分别为6.8与8.9米，宽均为1米。南、北廊外之散水各长9.3、宽1米。前者散水为卵石铺装，后者散水为瓦片砌就。东、西廊外散水各长5.9、宽分别为1与0.8米。二廊外之散水均为卵石铺装。

桂宫二号建筑遗址清理的排水系统遗迹有渗井和排水道。渗井位于遗址东北部。井口边长06、底部边长0.65～0.67、井深0.94米，井壁与底部均为砖砌。遗址东北部和西北部各发现一处排水道。前者水道为两壁和顶部砖砌，通高0.39、宽0.25米，后者水道不同地段构筑方法不一。水道之上有建筑物者为五角形陶水管铺设，而地面之下的水道上、下和两壁均砖砌。水道高0.145、宽0.33米。

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出土遗物以砖瓦和瓦当等建筑材料为主，另外出土剑、刀、镞、铠甲片，陶、铁、铜质等器物以及五铢、大泉五十等汉代货币。

从地层堆积来看，该建筑遗迹均覆盖于汉代文化层(第三层)之下。文化层内出土的大量粗绳纹瓦片和周边饰网格纹的云纹瓦当等遗物均属该建筑物废弃后的堆积，它们属于西汉中晚期流行的建筑材料。根据桂宫二号建筑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时代特点，推断桂宫二号建筑遗址时代应为西汉中晚期，其上限不会超过西汉中期，这与文献记载桂宫建于汉武帝时期是一致的。从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的废弃堆积中，尤其是从F2和F3之中的大量红烧土堆积来看，该建筑很可能毁于两汉之际汉长安城中战火。

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的主殿遗址与未央宫皇后所居椒房殿遗址和孝宣王皇后陵寝殿址之规模、布局结构基本相同，桂宫二号建筑遗址在该宫城所处位置重要，加之二号遗址出了不少“长生无极”文字瓦当，根据以上三点，我们认为桂宫第二号建筑遗址应属于桂宫之内的后妃使用的重要宫殿建筑。

广州南越国御苑遗迹

□ 1995～1997年，在广州老城区中心城隍庙前忠佑大街西侧的两个建筑工地，先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岭南地区秦汉考古方面的突破性发现：1995年的发掘，发现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大型石构水池，在池中清理出一批砖、瓦、木、石等建筑物件；1997年的发现是在靠近上述石池西南方约20米处，清理出一段石构的曲渠，长150米，保存大致完好，并证明了石池和曲渠同属一整体，为南越国宫苑的园林人工水景，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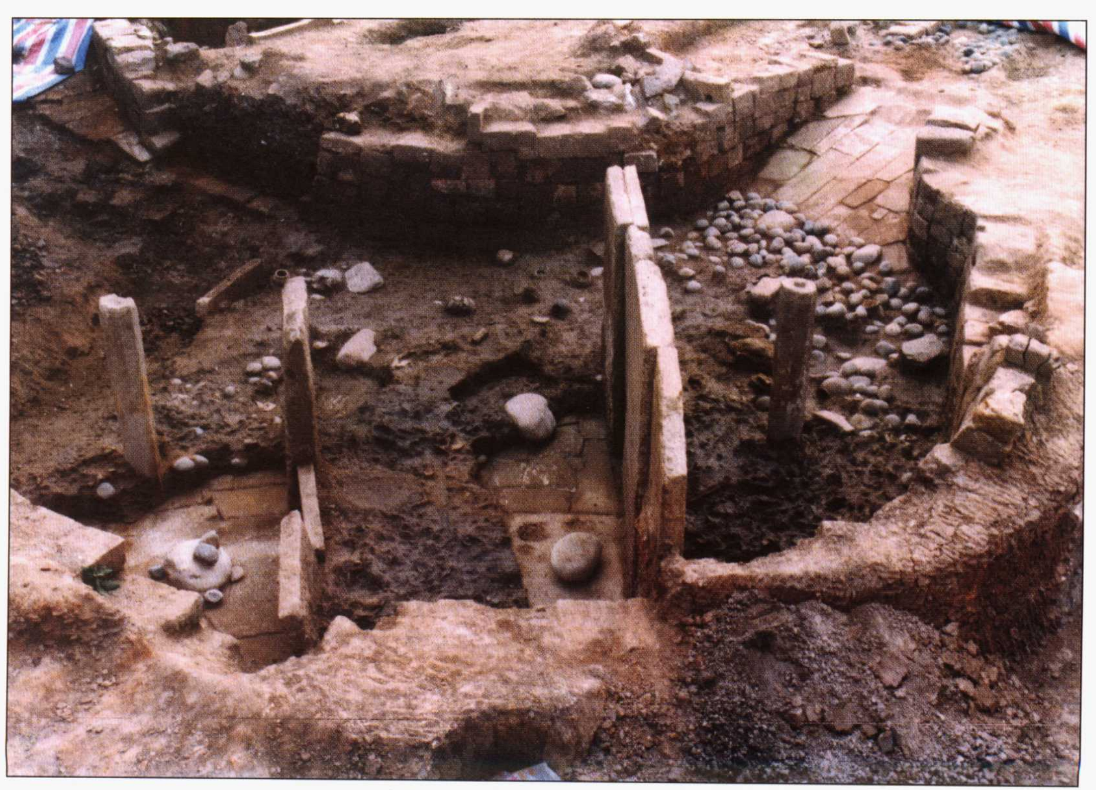
深埋于地表下5.8米的大型石砌水池，面积约4000平方米，仅清理出一角。水池如斗状，已清理出的两壁为斜坡形，深约3米，用不规则的砂岩石板铺砌，呈密缝冰裂纹状，砌工精巧。池底用卵石、碎石铺平。东北角有一处由打磨规整的



遗址全景（自东向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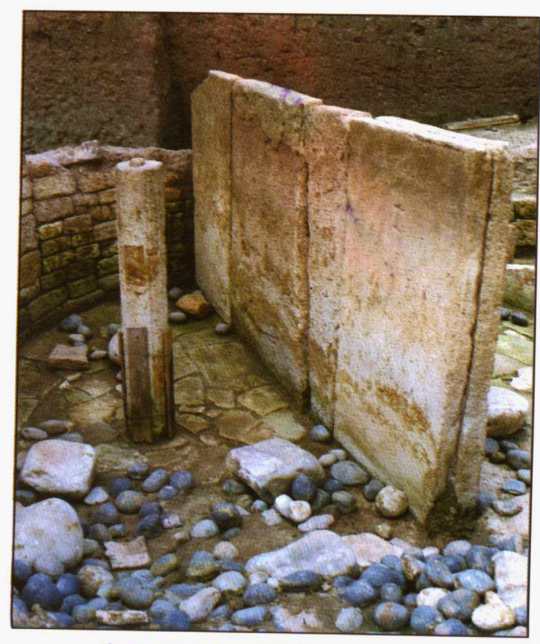


石渠西端尽头的出水闸门



弯月形石池内堆积的龟鳖残骸

石板平桥与步石



弯月形石池中的石板隔墙和八棱石柱



石渠内的渠陂和斜口


150米长的石渠蜿蜒曲折

汲水的木辘轳，几成炭状。其他木、瓦件也多被大火烧过。井的近旁还有大量同样的板瓦、筒瓦、各种规格的砖石和焦木等堆积，且呈由西向东倾倒状，显示出在井的西邻(今儿童公园)覆埋有南越国的重要宫室的迹象。发掘所见与《史记》、《汉书》南越传中关于汉武帝平南越，汉兵“火烧番禺城”的记载正相吻合。

深埋地表下5米的石曲渠，渠体的走向由北而南，急转向东连接一座弯月形的大石池，再由石池西出，蜿蜒曲折，贯穿整个遗址。渠两边各用石块砌壁，口宽1.34～1.4、底宽1.30米，现存最高1.17米。渠底铺石板，呈冰裂

大型方石筑成的叠石柱，已倒塌。南壁和西壁石板上，发现多处凿刻篆体文字，有“蕃”“冶”“阅”“皖”等，这是岭南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石刻文字。这个“蕃”字确定了该遗址的年代及所属。在石池之西相距约23米处清理出属南越国宫署的一口食水井，尚存深9米，结砌精巧。井内为砖、瓦、木、石所填塞，当中还有一个


水池池底


水池南壁凿刻的"蕃"字

纹铺砌，其上密排灰黑色的河卵石，其间还用大型黄白色的卵石疏落点布。已揭开的一段长约150米的石渠，有三个"斜口"和两个弧形大石板筑成的"渠陂"，用以限水，使渠内的流水通过渠陂时涌出浪波，与渠底密铺的灰黑色河卵石相映衬，形成粼粼碧波的人工水景。曲渠两端铺设一座石板平桥，是由两块打磨规整的巨石横卧在两边渠壁上构成。桥头的步石仅北面的尚存一段，共九石，作弯月形排列。曲渠西端尽头处，设有一方形出水闸口，分内外两层，内层是一个"凹"字形的石质方框，内侧及底均凿出凹槽，以纳控水的木板。外层为石箅，以滤杂物，闸口外连接木质暗渠。值得注意的是大型石池南壁也有一个导水的木渠，与石渠南北相对。迹象表明，两者是当时宫署建筑的一个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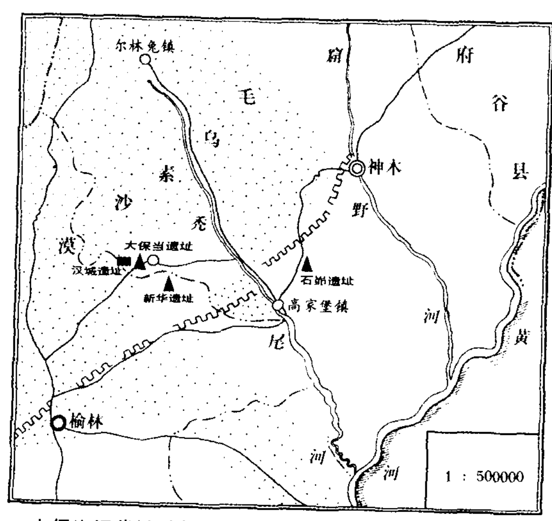
自1995年以来的3年间，在广州市中心区内相继发现了南越国的石渠和大量南越国宫殿、官署建筑的构件，这对探求南越国宫殿、官署及番禺城的具体位置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坐标，可确知其在广州现今的忠佑大街城隍庙以西，中山四路和五路以北，广东省财政厅以南到吉祥路以东这片地段内为汉初南越国的宫殿、官署区，其中今儿童公园当为主要的宫室所在地。



"长乐未央"瓦当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

□ 1996年，为配合陕京天然气输气管道建设工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榆林地区文管会联合组成考古队，曾对神木大保当汉墓群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汉墓24座，其中13座出土了精美的画像石。经过数次考古调查与钻探，在出土画像石的墓地北侧约2公里处发现一座保存完好的城址，并在城址周围新发现4处汉代墓群，初步确定了这个我国北方地区保存相当完整的汉代聚落遗址。



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位置示意图

1998年的考古工作主要针对城址进行，试掘了部分城垣及建筑基址，初步解决了城的布局和形制、城垣的构筑技术、城址的时代等问题。同时，对大保当汉画像石墓再次进行了钻探和发掘，确认了墓地的范围及其与城址的关系，新出土一批精美的画像石和陶器、骨器、铜器等重要器物。

城址面积约28万平方米，平面略呈五边形，由东北、东南及西、南、北五道城垣组成，其中北、西、南三面城垣较为规整地组成一个半包围的"方形"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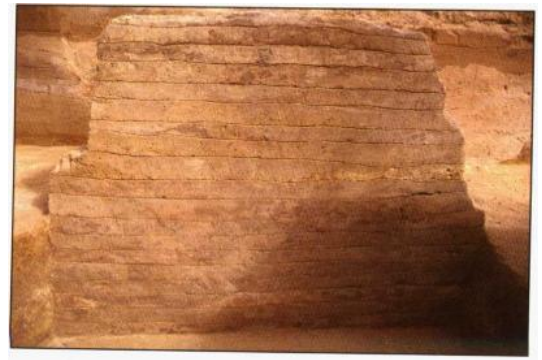
城内建筑遗迹

东段城垣向东部伸出，分为东北面和东南面两支，使城址东部略呈“三角”状。城内地势平缓，晚期沙丘与现代居民点散布其间，野鸡河自西向东流贯城址中部。



龙首柄骨器

城址的城垣周长约2200米，其中北墙长540、东北墙长370、东南墙长360、南墙长540、西墙长410米。西墙保存最好，一般墙体高出原地面约1米左右，个别地段达2米左右。



西城垣

通过西城垣的解剖可知，城墙的修筑分两步。先挖基槽，基槽宽约3、深1米左右，底部铺垫一层10～14厘米厚的沙土，未经夯打。从第二层起开始夯筑，夯层与夯层之间铺一层很薄的细沙。墙体略窄于基槽，宽2.5～3米，上窄下宽，剖面呈梯形。在城垣外约20米处，有一条与墙体平行的壕沟，深4、宽4.5米，应是筑墙取土所致，实际起到了护城环壕的作用。

城内建筑址上出土大量的建筑材料，包括大型板瓦、筒瓦、瓦当、菱形方格纹铺地砖等，其中瓦当除云纹外，还有“长乐未央”文字瓦当，残损严重。另外还发现一些生活用陶器等。

1998年新发掘的两座墓葬中，一座



墓葬出土画像石（东方天神句芒）



墓葬出土画像石（西方天神蓐收）

墓葬出土画像石（荆轲刺秦王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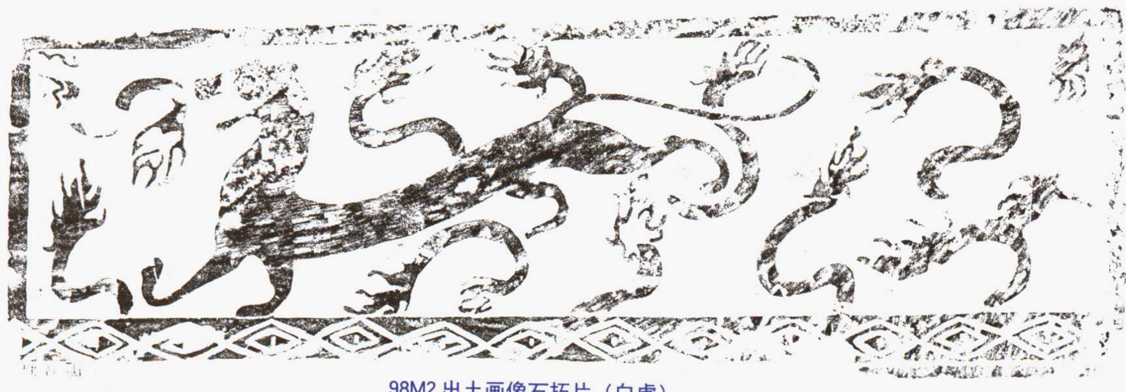




墓葬出土画像石（出行图）



98M2 出土画像石拓片（青龙）



98M2 出土画像石拓片（白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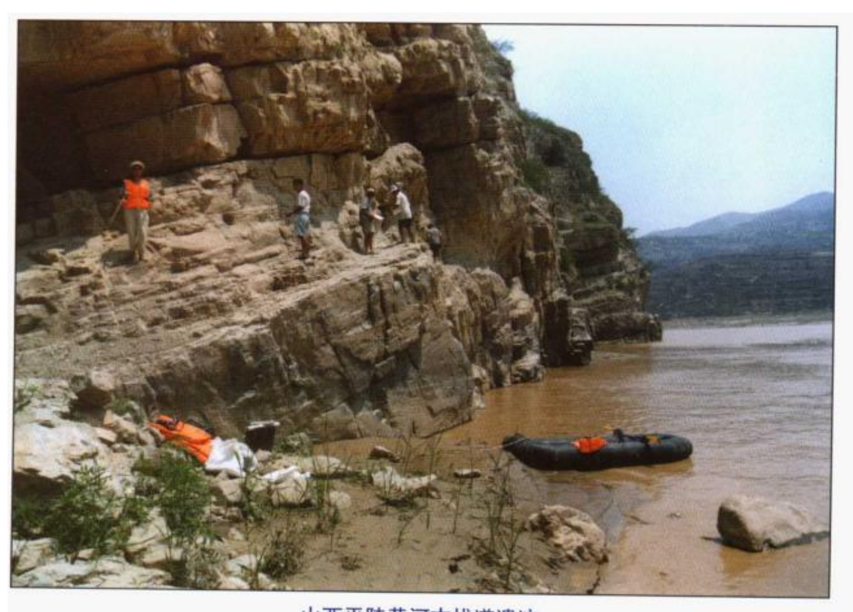
墓发现有画像石。其中门楣画像石刻绶带穿璧纹，空白处饰以奔马、龙头、云朵等；门柱一刻升龙，一刻奔虎，画面空间填白很少，明显强调了主题而淡化了装饰。墓葬中还新发现了大量的其他遗物，主要有各种罐、八棱喇叭口圈足盘口壶、鼎、奁、案、几、耳杯、勺、灯、博山炉、虎子、鸭、鸡、等陶器；斧、锛、铲、刀等铁器；箸、匕、铲等骨器；鎏金带钩、盖弓帽等铜器；肛塞、眼罩、鼻塞等玉器及黛砚和“货泉”、“五铢”铜钱等，与1996年发现多画像石而少器物的情况正好相互补充，为进一步认识这批墓的年代、文化性质等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城址与墓地的年代基本应与苏家岩纪年墓接近，属于东汉中叶。



墓葬出土画像石
（西王母图）

大保当城址及墓地均出一种肩部饰水波状划纹的小口细颈瘦腹罐，表明两者时代基本相同，而墓葬中出土的这种罐底部一般凿一小孔，不论是形态上还是制作风格上均与内蒙古和前苏联地区匈奴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它们被认为是匈奴文化最具特征的器物。《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东汉初年，南匈奴附汉，匈奴人与汉人杂居，东汉政府对南匈奴也大力援助，“岁时赏赐，动辄亿万”。大保当地处塞外这个汉时匈奴与汉频繁接触的地带，城址与墓地的考古发现正是这一时期匈汉两族和睦相处的反映。

晋豫黄河古栈道漕运及建筑遗迹



山西平陆黄河古栈道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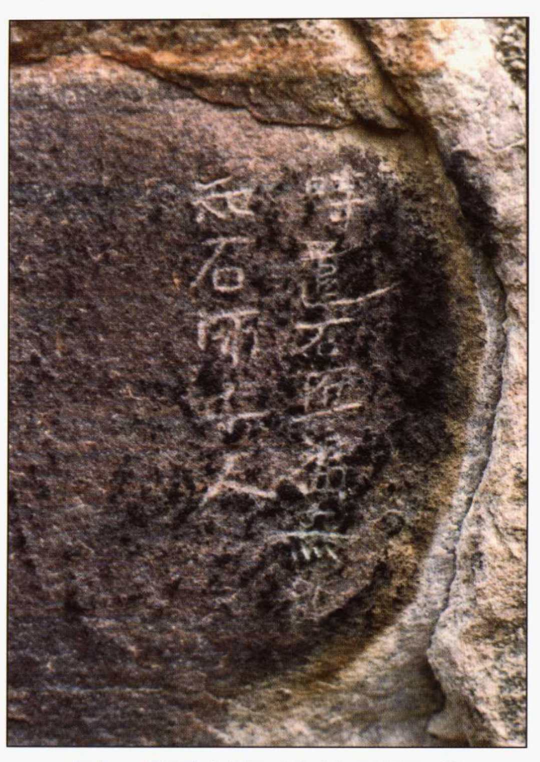
□ 1997年春至秋季，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库建设工程，山西省和河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三门峡以东的黄河北岸做了详细的考古踏勘和测绘，在沿河百余里地段内，发现古代黄河栈道遗迹40处，累计长5000余米。栈道依山傍河，时断时续，气势雄伟。栈道上残存的壁孔、底孔、桥槽、历代题记与立式转筒等遗迹类型繁多，数量丰富。这批实物资料对研究古代黄河漕运史、交通史、工程技术史及其在社会经济文化中的作用，均有重要价值。

栈道大多先依山腰向内开凿成“⊐”形通道，然后在通道岩石上开凿方形壁孔、牛鼻孔、底孔等。再插以木梁，梁上铺板，形成完整的栈道。但现栈道的所有木构件已荡然无存，只有各种壁孔和底孔残留于通道岩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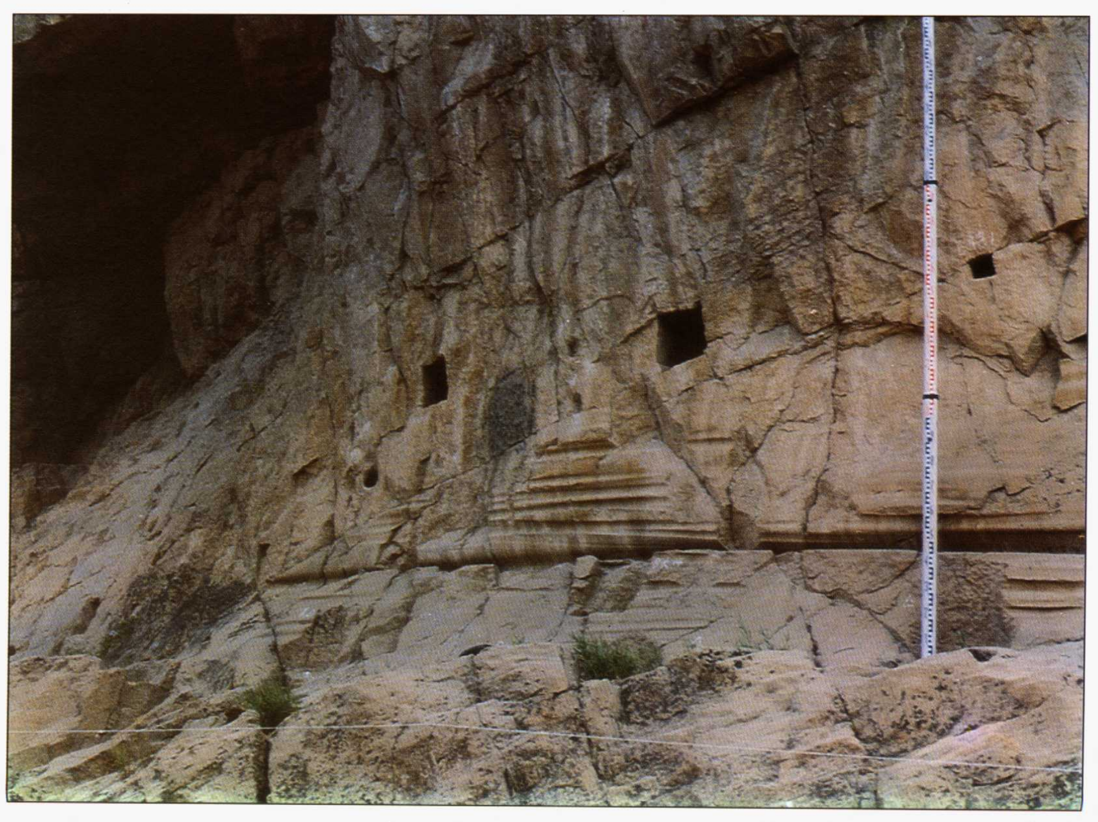
在残存栈道上，共发现大小方形或长方形壁孔1000余个（统称方形壁孔）、



山西垣曲五福涧地点东汉“建武”年题记上段



垣曲五福涧地点东汉“建武”年题记下段



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

牛鼻形壁孔600余个。方形壁孔的作用在于固定横列在栈道路面上的木梁，故开凿在贴近路面处的岩壁上，其因尺寸不同而有大小之别，宽高大多在12～36厘米之间，深度因保存好坏而不等。在一些地段，只有一种壁孔，而在一些地段，则是大小两种都有，反映出开凿时代前后的差异。无论大方形壁孔或小方形壁孔，其间距都大致相等。在特殊地段，间距稍有不同。

在栈道沿线共发现历代题记58处，每处题记多者200余字，字体有篆、隶、楷，最早纪年为东汉建武十一年(35年)。因黄河栈道与漕运的盛衰是同步的，故从纪年题记并结合栈道现存遗迹分析，其栈道修凿和使用开创于西汉，推广于东汉，唐代是最盛期，以后逐渐衰落。

黄河漕运是古代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命脉，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考虑，无论定都长安或定都洛阳、开封，均需利用漕运保证东西部地区粮食、物质的交流，尤其在西汉和唐代，漕运对稳定京师、救灾备荒、巩固统治等，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河南省洛阳市第二工作队在小浪底水利枢纽上游12公里的河南省新安县仓头乡盐东村发掘了一处大型的汉代仓库建筑遗址。仓库建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标高约185米，与黄河直线距离约600米，由主体建筑、附属建筑基址、墓葬区、烧窑区及其他附属设施组成。主体建筑整体呈规则的长方形，南北长179、东西宽35米，由墙垣、通道、柱础石、东墙外建筑、路面等遗迹组成。主体建筑不但规模巨大，而且构筑工艺也十分复杂。墙垣宽5.6～6.3、残高0～2.5米，为平板夯筑而成。墙垣内及东墙外分布着排列整齐有序、大小两种规格的柱础石。形状有近似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大都经过修凿，有一平整的面。小柱础石均分布在墙垣内，长宽约30～50厘米，残存南北向13行，东西向102列，南北间距1.4米，东西行距1.5米。每单元四周的柱础石均紧靠夯土墙，大柱础石略呈长方形，长80～100、宽40～70厘米，四周墙垣内与东墙外南北向共计5行。在东墙外有一处凸出建筑，为平地起夯，紧贴东墙，但与墙垣并非一体夯筑。现残存四个，基本分布是每单元对应两个，隔墙对应一个，两两间距约14米。突出部分凸出约1.4、宽约6.2米，每个突出部分中部均有一柱础石，其外侧又对应三块柱础石。主体建筑遗址内发现的路土较少，且不甚完整，主要集中在东墙和西墙外，南部保存较多，北部没有发现，路土厚5～10厘米，路残宽2～2.5米。另外在墙垣内发现有不成形的活动面。

附属建筑基础位于主体建筑东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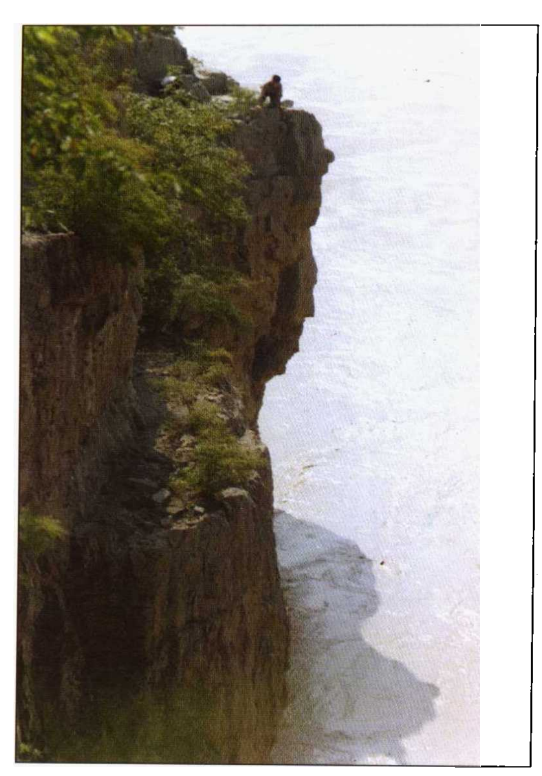
黄河古栈道洛阳段栈道防滑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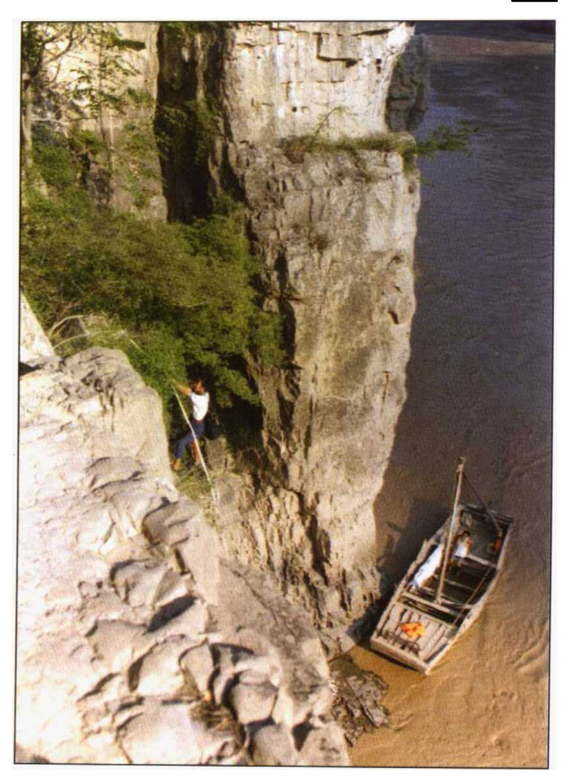


河南新安仓头乡汉代建筑遗址俯视



汉代建筑遗址（自西南至东北摄）


黄河古栈道洛阳段局部


黄河古栈道洛阳段考古工作现场

靠近黄河的一处高台上。在长11.5、宽15米的范围内发现有不完整的夯土台基和夯土基槽。从夯土结构和夯筑形制来看，其与主体建筑内的夯土基本一致，夯土内含物亦与主体建筑内出土物一致，据此可判断其时代应与主体建筑一致。

墓葬区主要分布于主体建筑西南部800米三级阶地以上的坡地上，发现10座墓葬，均为汉代小型土洞墓。随葬器物有釉陶壶、陶猪圈、陶奁、陶罐、铁刀等。

烧窑区位于主体建筑东北300米处，共发现5座烧窑，其分布呈环状，烟道均朝向窑区中心。所有烧窑均由操作间、挡火台、火门、火道、火膛、窑床、窑室、烟道等部分组成。

附属设施主要是生活用水井，呈环状围绕主体建筑。目前共发现9口井，清理发掘4口，均为圆柱形，平面直径1.2米左右，两侧有两排脚窝，其始筑时代与主体建筑相同。

出土遗物主要是板瓦、筒瓦和“关”字瓦当残片，铜钱有西汉五铢和货泉各一枚。另外发现一块半截空心砖，其正面模印叶纹、“五铢”钱纹及“永始二年造”文字。

通过该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板瓦、筒瓦和“关”字瓦当以及其独特的建筑形制，初步推断它是西汉中期构筑的一处属于汉函谷关体系并与黄河漕运密切相关的国家仓库遗址，其使用年代延续至东汉。



骆驼城遗址远眺

甘肃高台骆驼城西晋墓

□ 1998年6月，高台县为保护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骆驼城遗址，在城南修筑防洪坝的施工现场发现一座西晋砖室墓，出土彩绘木板画、彩帛旌铭等珍贵文物。

墓葬位于骆驼城东南墓葬区北沿较高的砾石土丘上。地面无封土，地表0.85米以下出现照墙，照墙砌砖三平一竖，墙宽1.38米，直接筑在墓室门五层拱券上。墓室距地表深6.3米。

墓室为券顶单室，长3.84、宽1.15、高1.66米。室内置木质单棺，长2.36、宽0.72、高0.76米，板厚0.11米。棺木头向东南，棺前挡已朽，棺盖落入棺内。

墓室门至棺木间摆放随葬品。棺前有小木盘，长25、宽16、高3.6厘米，平底，置地上，内有一节树根。沿北墙根摆3件深灰色粗陶器，陶釜口径8.5、底径6.7、腹径12、通高9厘米；釜上放陶甑，口径13、底经6.5、高7.8厘米，底有孔，径1厘米；旁置陶钵，口径16、底径8、高8.1厘米。此3件为新制随葬明器。棺前中间放陶碗，口径14.8、底径8、高8厘米，平底；碗旁置陶盘，口径19.6、底径11、高3.3厘米，平底。碗和盘较陈旧，应为日常实用器。碗内盛白色粉状物和一块肉。沿南墙有小羊骨架1具，头东尾西。羊骨前面置彩绘木板画，画面朝向墓内。画旁置一彩绘木插座，座长20、宽9.5、高5.5厘米，中间有一道宽2.1、深2厘米的凹槽，木板画原应插于此座上。彩帛旌铭斜搭在棺盖上，上压一黑、白、红三色彩绢粗线缝制的食物袋（已朽），内装面食和肉块。

尸骨仰身，为男性。棺内除已腐朽衣



彩绘木板画



彩绘木插座



彩帛旌铭



墓室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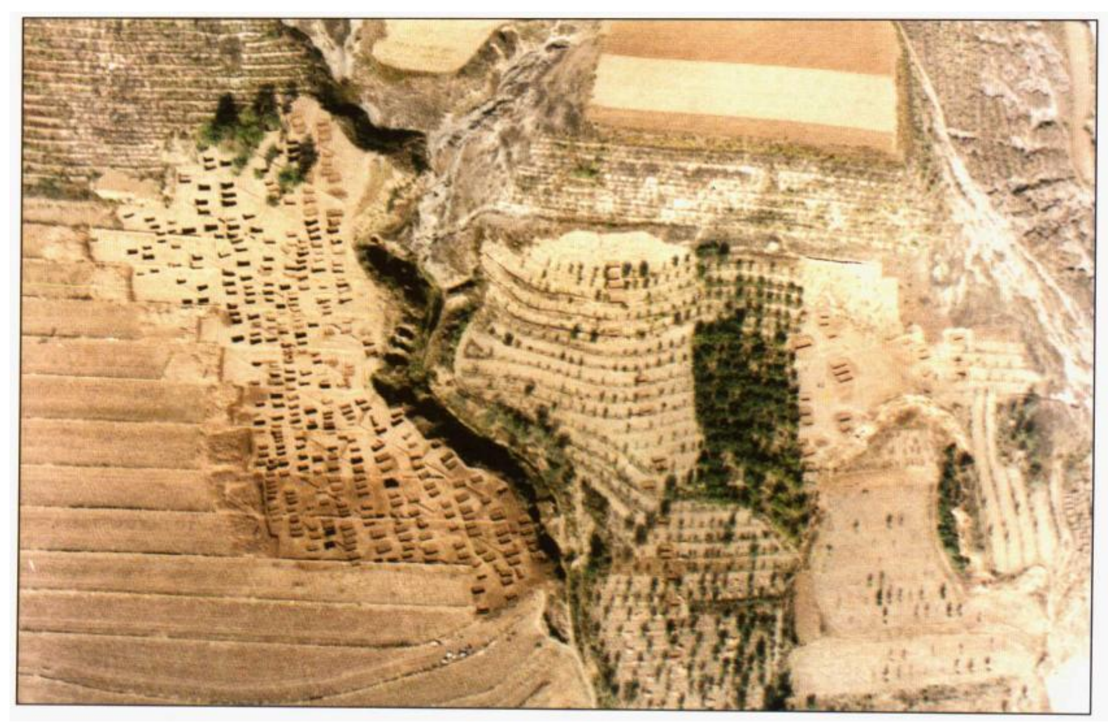
物外无其他随葬品。根据墓室规模和随葬物推测，墓主人应是较富裕的平民百姓。

墓室内随葬的陶器是骆驼城北1.5公里处五座窑陶窑遗址的产品。在陶窑遗址遍地散布各种纹饰的碎陶片，其中不乏与此墓出土陶器类似的陶片。在古代河西走廊，特别是骆驼城附近的居民,以陶器为主要的生活用器。

木板画的材质为松木薄板，长32、宽24、厚2厘米，板面以白垩粉涂底，黑线勾划轮廓，朱红色填充，构成主次分明的生动画面，内容有人物、牛车和高大的马匹等。

彩帛旌铭为深红色，织工精细，长71、宽50厘米，下部略有残缺。旌铭中央书白色隶书18字，为“元康元年十二月庚戌朔晋故凉州酒泉□□”。西晋元康元年为公元2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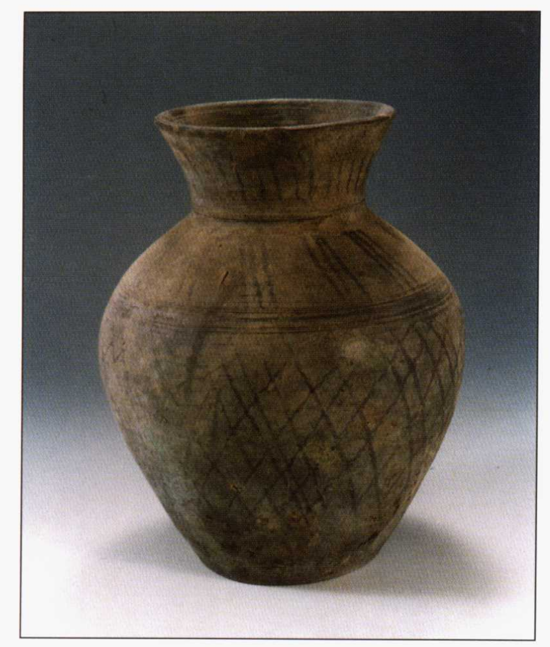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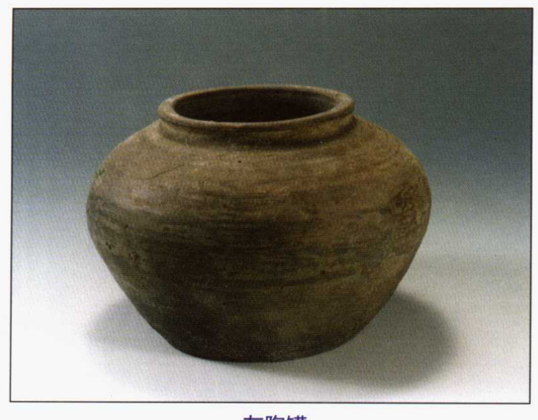


喇嘛洞墓地鸟瞰

☐ 喇嘛洞墓地位于北票市南八家乡四家板村喇嘛洞村民组西山南坡上，地表已辟为梯田。一条由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冲沟将墓地分为沟东（Ⅰ区）、沟西（Ⅱ区）两部分。自1993年起，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朝阳市博物馆和北票市文物管理所对该墓地进行了多次发掘。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98年5～11月进行的第5次发掘。这次工作的重点在沟西，共清理墓葬369座（包括沟东新发现的8座）。加上历年发掘的66座墓（沟东45座，沟西21座），全墓地计有435座墓。其中三燕时期墓葬419座、其他时代墓葬共16座。

沟西的墓葬自西北向东南依山势布列，占地面积近7000平方米。墓群由东至西可分为12排，保存最长的一排尚有41座墓，余者也多在30座以上。诸墓之间排列较紧密，但极少有打破关系。墓向一般在40°至65°之间。同沟东墓葬相比，沟西皆为中小型墓。在墓葬形制上除了占绝大多数的土圹竖穴木棺墓之外，还新发现了10余座呈前宽后窄形状的小型石椁木棺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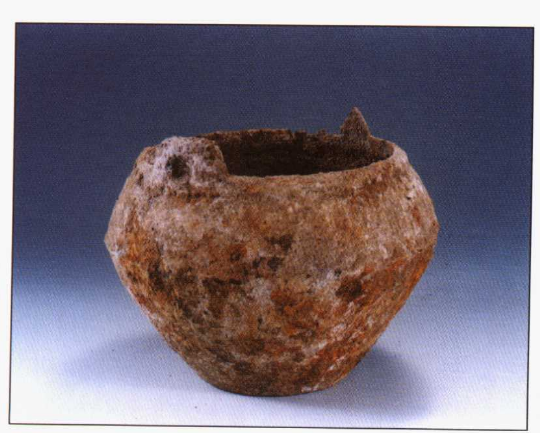

灰陶侈口壶


灰陶罐


铜 魁


铜 甑


铁 镘


铁 釜



铜四铃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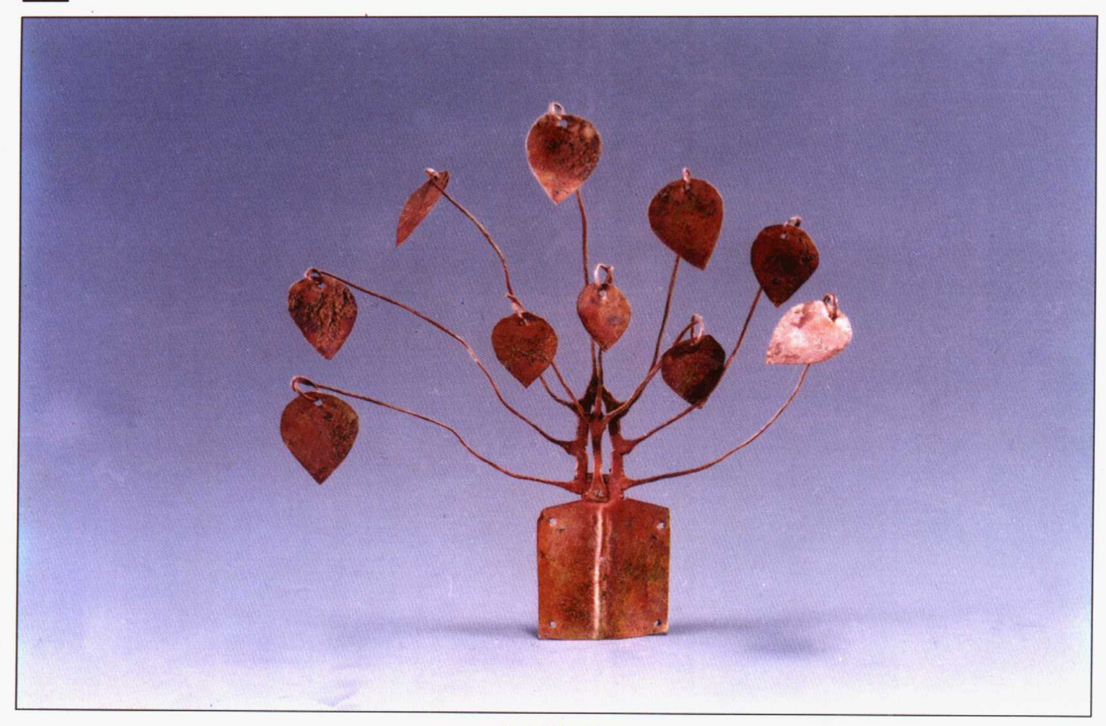
铁犁铧



鎏金铜盖脸



铜鹿形饰



金步摇冠饰



酱釉卧羊陶尊


鹿纹金牌饰

此次发掘最大的一座墓为M266。该墓为夫妻合葬，长3.5、宽2.4、存高0.65米。棺内头骨附近置有陶壶、漆盘、耳环、铜釜、甑、灯座和金发簪、耳坠及银环首器等。男性骨架旁侧分别置铜鹿形饰、铁剑、刀和矛，趾骨下置铁马鞍、带具、铜节约、缀泡套管摇叶和扣饰等，尤为珍贵的是与之共存的还有1件木芯包铜边的马镫。女性趾骨下则陈放铁铧、锸、铲、镰、斧等生产工具。

M101是全墓地中为数很少的几座随葬鎏金镂孔錾花铜马鞍桥的墓葬之一。该墓棺长2.86、宽0.86、高0.32米，方向58°。铜马鞍桥包括前桥和后桥两部分，一上一下分置于人趾骨下。其他共存器物还有铜带卡、扣饰和铁剑、铲、镰等。

在清理的369座墓葬中，共出土三燕时期文物3670多件，其中以铁器为最多，达1460多件。其他有铜器680余件(枚)，陶器500余件，金银玛瑙等装饰品和杂器1000多件(套)。铁器可分为兵器(长剑、环首刀、矛、镞等)、生产工具(铧、锸、铲、镰、斧、凿、穿等)、马具(鞍桥、衔、镳、带扣和马掌形器等)和生活用具(釜、镘、镜等)四大类。此外，还常见有一种与环首刀柄相似的片状环首器，均置于棺内头侧，是一个有特点的随葬现象。铜容器中以釜和镘为多，也有少量盆、罐、甑、魁等。鎏金铜马具中则以缀泡套管摇叶和压制的花瓣状扣饰最为常见。M196出土的一套完整的鎏金镂孔铜带具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它由带扣、带銙、摇叶和铊尾等构成，其间的排列顺序明确，是研究当时服饰的重要标本。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器形多为展沿深腹或侈口鼓腹壶，在其颈、肩、腹部多饰有暗纹，肩上还刻数道弦纹。其他还有夹砂大口罐、泥质灰陶卷沿罐和奁、钵等。釉陶则为酱色或近豆绿色釉四系小罐和碗等，其中M28中所出酱釉卧羊陶尊较为罕见。金银饰品中以耳坠最具代表性，一般用金或银丝联缀多个圭状小摇叶，有的还串饰玛瑙珠，这与吉林老河深墓葬中所出者很相似。压制有鹿形纹的金牌饰也曾见于内蒙古地区匈奴墓葬中。银器中以发钗、指环居多。另有一种由铅锡合金制成的鹿角形器，此物随葬较普遍，一般置于胸或腹部，其用途尚有待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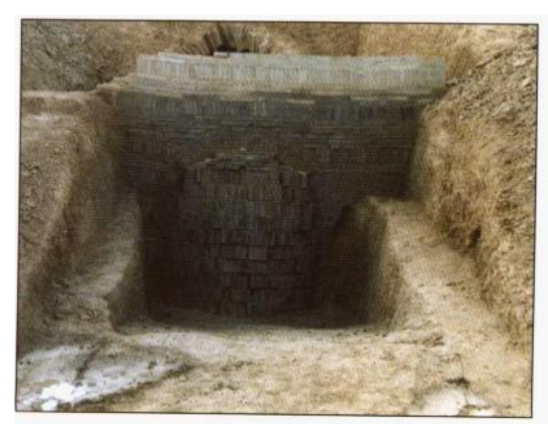

高氏1号墓出土金珰

南京六朝家族墓地

□ 1998年6～8月和9～12月，南京市博物馆为配合基本建设，先后对东晋高崧家族3座墓葬和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进行了发掘。

东晋高崧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市东郊10余公里的仙鹤观南麓，3座墓葬略呈“品”字形分布，均系砖筑结构。砖室规模较大，全长均在7米以上，墓室高达3米余，分“凸”字形穹隆顶和“凸”字形券顶两种类型，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墓内多设砖砌棺床、灯台、灯龛及直棂假窗等，墓前有较长的斜坡墓道。砌墓所用的青灰砖有长方形、楔形、刀形三种，部分墓砖端面、侧面刻划或模印花纹和文字，文字砖有纪年和吉祥语两类。

随葬品丰富而精美，以成组成套的玉佩饰、玉剑具和各类金饰品为大宗。金


高氏1号墓斜坡墓道及封门墙


高氏1号墓墓室后壁

器以小型装饰品为主，主要有钗、簪、镯、铃、环、牌、珠、顶针、耳挖以及圆形、心形、花形等金饰片，此外还有多种动物形小挂饰，如辟邪、羊、比翼鸟、龟、蛙等，腹部均有穿孔，器形小巧，刻划细致。玉佩饰有佩、璜、璧、珩、珠、辟邪等，玉剑具有剑首、剑格、璏、珌，其他日常实用玉器和葬玉还有带钩、杖首、玉猪等。这批玉器质地多样，造型优美，精工细琢，使用阴线刻、透雕、圆雕、剔地浅浮雕、高浮雕等多种技法，明显区别于汉代玉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出土的银器有鎏金带盖银炉、银箸、银铃等，铜铁器有鎏金铜砚滴、错金铜弩机、鎏金铜支架、铜砚、铜耳杯、鎏金铜钗、鎏金铜环、铜钱以及铁剑、铁镜、银链、铁剪等，其中鎏金带盖银炉、鎏金铜砚滴、鎏金铜支架是这一时期同类器物的首次发现。鎏金铜砚滴构思巧妙，铸造精良，作异兽口衔耳杯状，异兽头生双角，四肢曲伏，长尾曳地，腹侧羽翼丰满，腹部中空，并通过兽口中央小孔与耳杯相通，是一件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珍贵文物。

出土漆木器主要有漆盘、漆盒、漆耳杯、木篦、木梳、木印等。这些漆木器因南方酸性土壤浸蚀而保存不佳，但器口、器腹多镶有铜釦、铜铺首，一件器顶还镶嵌了鸡心形玻璃片，这类装饰工艺为以往罕见。陶瓷器数量较少，主要有青瓷带盖罐、盘口壶、鸡首壶、钵、盏以及陶质小壶、盘、耳杯、果盒等。此外，还有墨、玻璃罐、水晶珠、琥珀挂饰、蜡板以及绿松石、料器、云母等文物。

这3座墓葬时代分别属于东晋前期、中期和晚期，其中2号墓墓室前部出土2方极珍贵的砖质墓志。据墓志，该墓墓主为东晋侍中建昌伯广陵（今江苏扬州）人


高氏1号墓出土鎏金铜砚滴


高氏1号墓出土羊形金挂饰


高氏2号墓（高崧墓）出土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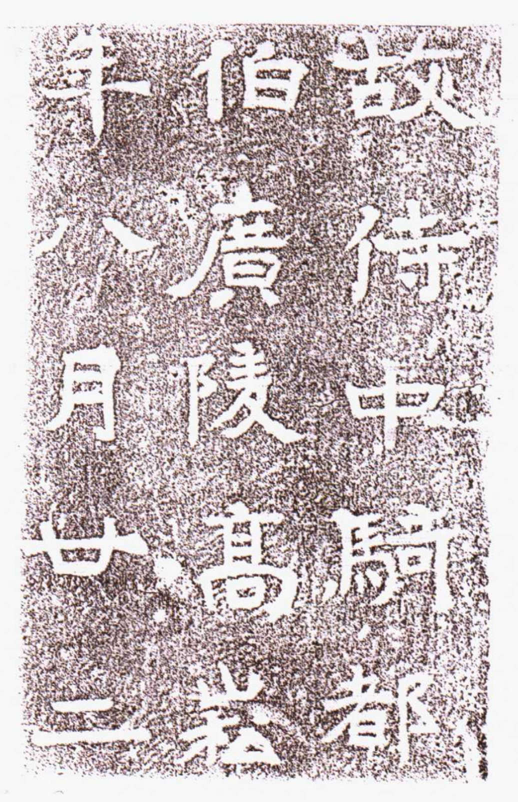


2 号墓出土高崧墓志

高崧及其夫人谢氏。高崧卒于太和元年(366年)，谢氏卒于永和十一年(355年)。高崧其人《晋书》有传，《世说新语》、《建康实录》等文献亦有关于他的记载。根据当时世家大族聚族排葬的规律分析，另



高氏 2 号墓出土玉带钩



高崧墓志拓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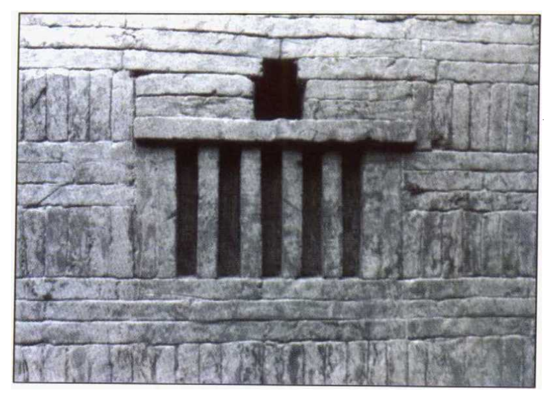
两座砖墓墓主可能为高崧父母高悝夫妇及其子高耆。

王氏家族墓地位于南京市北郊，此次发掘的3座墓均位于象山中段之南侧山坡，埋葬较深，墓室距现今地表 10 米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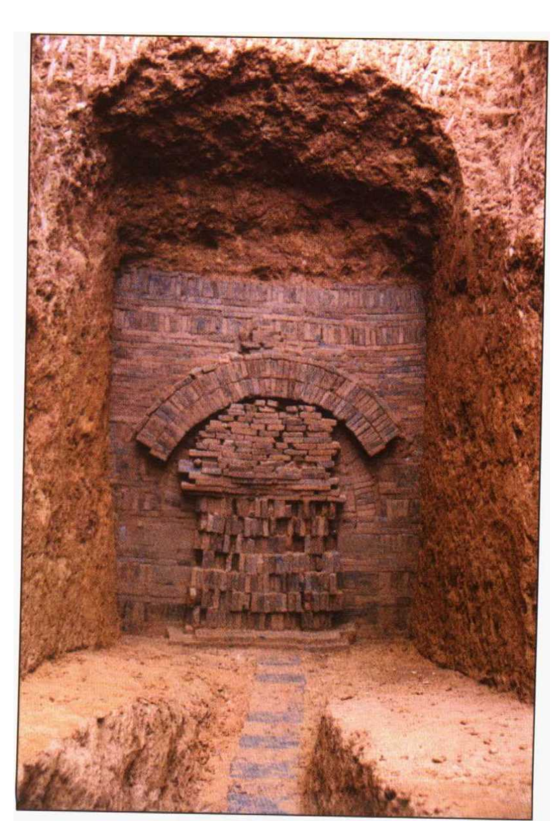


高氏 2 号墓出土玉佩


高氏 3 号墓墓室结构


高氏 3 号墓直棂假窗和灯龛

右。3座墓呈“品”字形分布，依次编号为象山8号、9号、10号墓。8号墓在前，9、10号墓在后，墓向均为170°。墓葬为带甬道的单室砖砌券顶墓，有明显的墓坑和墓道，墓坑为长方形，上宽下窄，上宽3.3、下宽2.2米，坑壁有约15°的坡度。墓前有斜坡墓道，由北往南倾斜，倾角为30°，墓道一般与墓门同宽。墓门朝南，墓前有较长的砖砌下水道，一般由五层砖平砌而成。3座墓规模相近，长4.5、宽2、高2米左右，墓门有封门砖和挡土墙。墓室砌法一致，墓壁均以“三顺一丁”组合砖上砌，东、西、北三壁均设“凸”字形小龛，内置青瓷小盏，底部铺地砖。墓坑口上有封土堆，虽年代久远，封土堆高度仍达3～4米。


象山 10 号墓墓门及封门墙


象山 10 号墓墓门前排水沟



象山9号墓出土铜炉



象山9号墓出土瓷熏

3座墓中，仅9号墓保存完整，未见盗扰、倒塌现象，室内淤土厚不足5厘米，随葬品原位放置，保存如此完好的六朝墓葬在以往的发掘中是极为少见的。

随葬品除个别外，均为六朝墓中所常见。其中8号墓出土砖质墓志、瓷器、陶器、铁器等；9号墓出有砖质、石质墓志共3方，其中砖质墓志一方，出土于墓门上方墓坑之填土内，此种现象为以往发掘所未见。石墓志2方分别平置于墓室前部左右两侧。墓中还出土金器、玉器、铜器、滑石器、瓷器、陶器等。10号墓盗扰严重，仅有石质墓志及少许瓷器、陶器等。3座墓出土随葬器物主要有青瓷盘口壶、鸡首壶、砚、熏、盏，陶耳杯、盘，金簪、环，玉带钩，滑石猪，铜弩机、镜、炉及铁镜等。其中错金高浮雕人物神兽大铜镜、三足铜炉、仿汉长方形石砚和刻铭铜弩机(有铭文“黄武六年……司马冯图……作努铜……要引檠……付藏吏吴厚”等31字)等文物，为以往东晋墓中所未见。

从出土墓志可知，8号墓主为东晋丹杨令、骑都尉王企之，卒于泰和二年(367年)；9号墓主为东晋振威将军、鄱阳太守、都亭侯王建之，卒于泰和六年(371年)；10号墓出石质墓志1方，字迹已不存，无法确认墓主，但从墓葬排列位置等可以肯定也应为王氏家族成员。

陕西华阴西岳庙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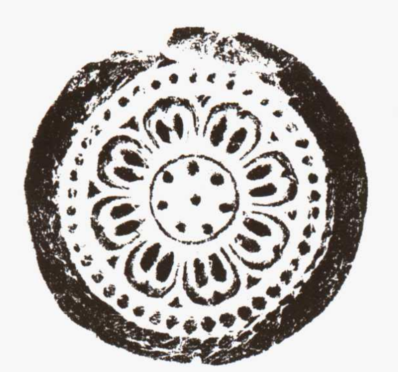

唐代三彩盒盖

□ 西岳庙位于陕西华阴县岳庙镇东侧，南距华山5公里，西距县城2.5公里。西岳庙是古代谒祭华山之所，自汉武帝初创以来，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庙曾经迁址和多次扩建，发展到明清时期规模宏大，占地180余亩，筑有外城、月城、重城和宫城，各类建筑共计200余间。庙内大部分建筑在清代末年被毁坏，现存建筑除外城墙之外，内仅存有棂星门、金城门、灏灵殿、望河楼和部分碑楼及石牌坊。1987年西岳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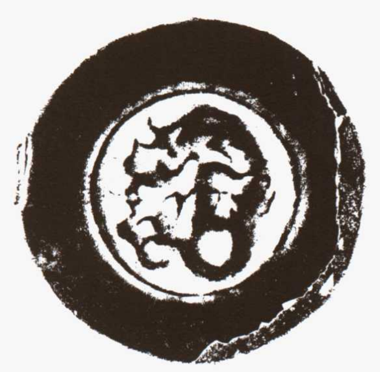
1996年下半年开始，陕西省文物局委派省考古研究所对西岳庙已毁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历时两年半。先后发掘了清代寝宫、角楼、五凤楼和山门屋顶等基址，还发现了明代寝宫和魏晋至唐时期的庙域围墙及殿堂基址，同时出土了一批各时代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材料和货币及陶瓷器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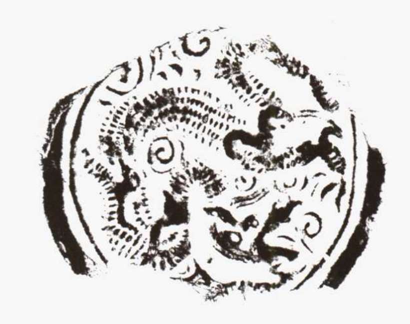
宫城与寝宫是庙内主要建筑之一，寝宫东西北三面绕有宫城，南与灏灵殿相接，为一封闭式小院落，现残存有宫墙基础和寝宫月台。寝宫和两侧司房坐落在“凸”字形月台之上，月台用条砖包砌而成，前部宽45、后凸部宽31、总长36米，高出原来地面0.5米。月台上的寝宫和司房基址已被破坏。明代寝宫月台叠压在清代月台之下，呈“工”字形，前部


唐代花草纹方砖


唐代莲花瓦当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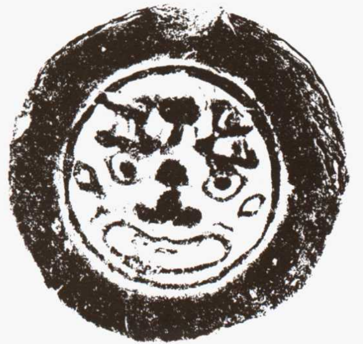

元代龙纹瓦当拓片


宋代龙纹瓦当拓片


明代龙纹瓦当拓片


宋代牡丹纹瓦当拓片


清代龙纹瓦当拓片


宋代兽面瓦当拓片


清代龙纹瓦当拓片


清代宫城和寝宫月台

压在现存的灏灵殿之下，后部已发掘出土。月台呈方形，长宽15米左右，高出原始地面约1米。月台前的穿廊宽6、长7、高约1米。在穿廊两侧设有左右侧阶，右阶破坏严重，左阶下残存葵花纹方砖铺成的路面。在明代的寝宫基址之下，还叠压有早于明代的建筑基址。

经勘探和发掘，西岳庙在明清两代均设有重城，形制呈长方形。清代重城长270、宽105米左右，占地约43亩，重城四周共设有十门，除棂星门外，其余九门均被破坏。清代曾对西岳庙作过多次修葺。从重城的布局看，与乾隆年间刻勒的《西岳庙全图》碑上的重城布局相似，只是重城在外城内的位置与方向与图稍有不同。在清代重城之下叠压有明代重城，其布局与清代重城基本相仿，只是长宽略有不同。


唐代莲花瓦当

魏晋至唐代时期的西岳庙布局呈正方形，长宽100余米，占地面积约20亩，围墙用褐色五花土筑成，宽1.5、残存高0.3～0.7米。夯层厚0.19～0.3米。围墙的内外壁面涂抹白灰，在墙底部还绘有宽20厘米左右的红色彩带。在局部段落，保存有多层白灰墙皮，说明此墙不仅延用时间长，而且经过多次修葺。

出土遗物有唐代莲花纹方砖，“天宝九载”、“大中”年号的方砖和莲花纹、菊花纹瓦当以及唐三彩盒、瓷碗和“开元通宝”钱等；宋辽时期的灰陶兽面瓦当和牡丹纹、龙纹、琉璃瓦当，牡丹纹滴水以及“祥符通宝”、“政和通宝”钱等；金元时期的绿色琉璃龙纹瓦当、滴水、酱釉瓷碗和“正隆通宝”钱；明清时期绿色、黄色龙纹瓦当，龙、凤纹滴水以及瓷器残片和“乾隆通宝”钱等。


明代龙纹瓦当

内蒙古海拉尔
谢尔塔拉1号墓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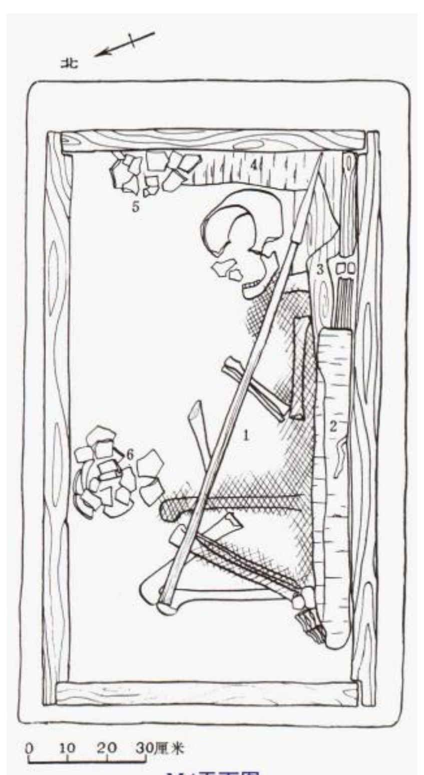
□ 谢尔塔拉1号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东北约15公里的台地上，南距海拉尔河约2公里。1997年9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海拉尔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海拉尔市东北部考古调查时首次发现。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8年9～10月，对该墓地进行了首次发掘，共揭露面积337.5平方米，清理不同规格的古墓葬10座，出土金、银、铜、铁、陶、桦树皮器等各类文物200余件。这是一种新发现的草原民族的文化遗存。

谢尔塔拉1号墓地的总面积约1万余平方米，墓地的南部略有破坏，中部和北部保存完好，本次发掘墓地中部的10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呈西北——东南向分布。所有墓葬均有木棺，形制略有差异。通常在墓坑四壁竖立木板，形成棺壁，其上搭盖横板或竖板组成棺盖板，有的还在棺盖板上铺盖一层整齐的桦树皮。除一座墓外，其余均无棺底板。墓主人均为侧身屈肢葬，头向朝东南，面向朝北或东北。除一座墓为双人合葬外，其余均为单人葬。随葬品多放置在墓主人的头前或身体的左、右两侧，也有的压放在墓主人身上，或是墓主人随身佩戴的装饰品。

M6是已发掘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



谢尔塔拉I号墓地发掘现场



M4平面图

座，有一棺一椁，墓口长1.9、宽1.06、深1.07米。木椁四壁由4块木板组成，盖板由5块竖板拼对而成，椁长1.8、宽1米，无椁底。木棺加工精细，棺壁的转角处有榫卯结构，棺盖板和底板均由加工平整的木板组成。墓内出土随葬品十分丰富，大多保存完好。墓主人身上斜置一件木柄铁头的长矛，长1.4米，矛下压放一件长达1.5米的木弓，弓的外壁包裹一层桦树皮。墓主人头下枕着一件由桦树皮加工而成的马鞍鞯。头部右侧依次放置1件陶罐和2件木盘，在其中1件木盘上还放置1双木筷子。墓主人的背部顺放一件桦树皮制成的箭囊，里面装有数十枚木杆铁头的箭。此外，墓主人身上还穿有几层麻、丝织衣物。

M5是一座双人合葬墓。墓口长1.7、宽1.2、深1.49米。木棺有盖无底，棺盖板由5块横板组成。棺长1.56、宽1.11米。



M4 开口层位


M5随葬的桦皮罐



M6发掘情况


M6墓主头枕马鞍


M6 随葬的弓


M8 随葬的陶器


M10 棺盖板上的桦树皮


M1 出土金耳环

M1 出土螺旋形银饰

两位墓主的葬式相近，西南侧墓主的头部与东北侧墓主的肩部平齐，且头骨的左侧有两个明显的钻孔。东北侧墓主的头部右侧放置1件桦树皮罐和1件短木柄铁矛，靠近东北侧棺壁顺放1件桦树皮制成的箭囊和弓。西南侧墓主的脚腕部还出有2枚绿松石珠。

M9长1.1、宽0.73、深1.1米。墓棺无盖无底，仅在墓坑东北、西南两侧放置了两块长木板。墓主人葬式奇特，面部及上身朝下，双腿侧屈，是惟一的一座俯身屈肢的墓葬。随葬品仅有在头部的左右两侧放置的陶罐和桦树皮罐。

发掘结果表明，谢尔塔拉1号墓地应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古墓群，这10座墓葬的形制、埋葬习俗及出土的随葬品与以完工、扎赉诺尔、拉布达林等墓地代表的两汉时期的鲜卑遗存明显不同，又与呼伦贝尔草原典型的辽时期的遗存(以巴彦库仁墓葬为代表)差别显著。陈巴尔虎旗西乌珠尔几座清理过的墓葬文化面貌与这次发掘的墓葬有相近之处，其中M1棺木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树轮较正)为公元667～797年。俄罗斯东后贝加尔地区也曾发现过一些相关的文化遗存，以奥克拉德尼科夫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将其统归为布尔霍图伊文化，该文化年代下限定在公元8～10世纪。据此初步推断，谢尔塔拉1号墓地的年代为公元7～10世纪左右。这一发现为研究呼伦贝尔草原地区古代民族、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河北井陉窑
河东坡窑区

□ 1998年7～10月间，为配合307国道拓宽工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当地市县文物部门，对井陉治域以西15公里的井陉窑河东坡窑区进行了抢救性勘探、发掘。勘探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掘窑炉7座、澄浆池1组、作坊1处、灰坑14个以及金代仿木结构砖室壁画墓1座。获得完整或基本完整的瓷器(含窑具)400余件，以及一批典型的井陉窑瓷片标本。

澄浆池由南北相连的两个以匣钵和石块砌壁、以砖石铺底的方坑组成，口径分别为2.1和2.3、深1.1和1.35米，底部略小。池子的下部分别存留0.2和0.5米厚的深灰色矸子泥。从南池口、底均低于北池来看，泥浆原来从北向南流动。在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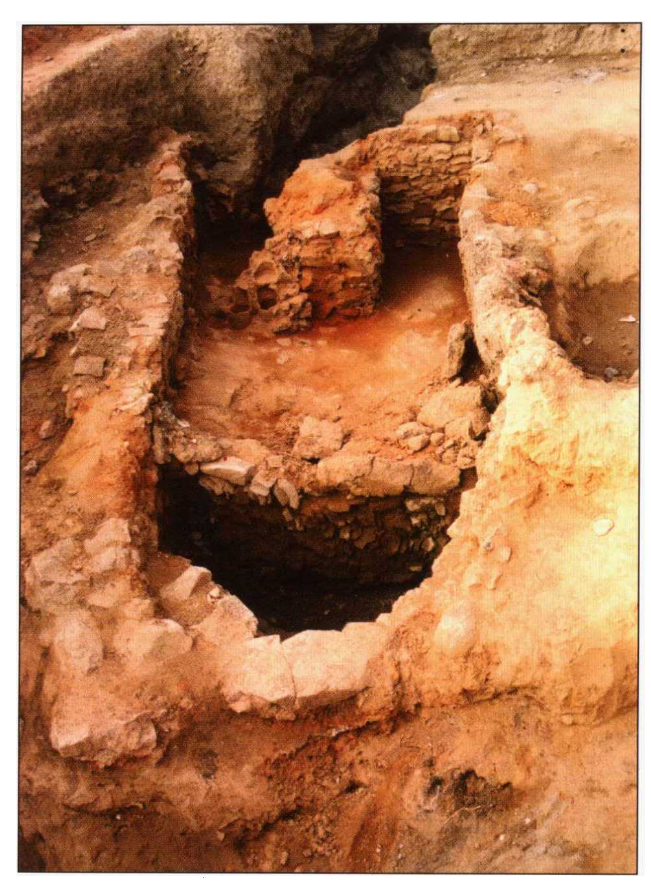


窑址Ⅱ区金代作坊遗址

浆池北30米处发现的作坊残迹为两间房子，东面一间南北长约7.5、宽约3.5、残留壁高0.8米左右，用石块垒成，地面平铺方砖。房间被匣钵垒成的隔墙隔成南北两间，北间较小，堆放矸子泥；南间较大，室内放置2个黑釉带盖缸。西面一间堆放褐黄色釉土。遗迹表明，作坊原为窑场成型上釉的工作间。作坊及澄浆池同为金代遗存。

发掘的窑炉形制、规模与保存程度均不相同，其中3座保存比较完整，有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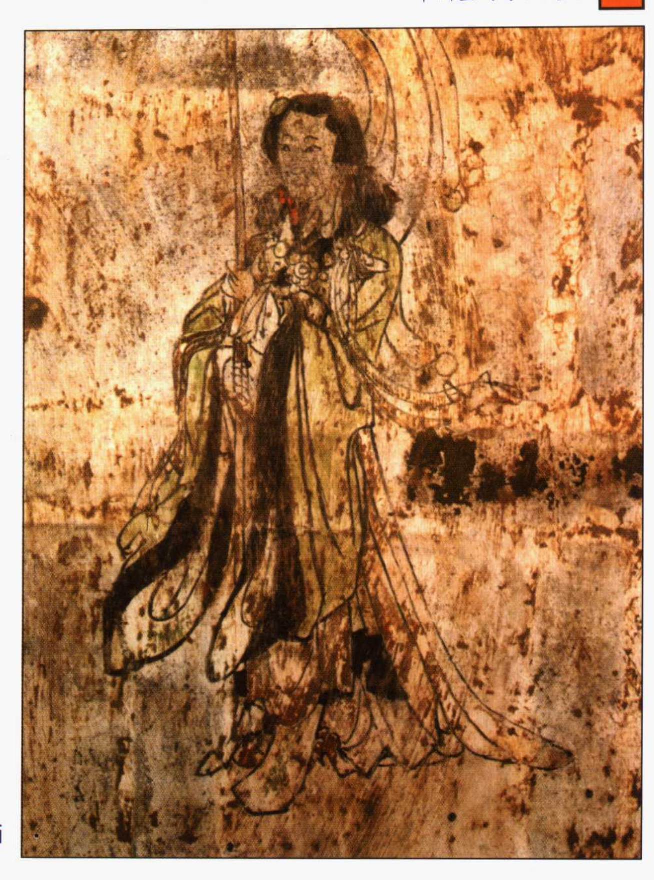
Y3为金代窑，由灰室和窑床组成，东西向，窑床在西，外为圆形，内近正八边形，内径仅1.5米，周壁用匣钵、石块垒成，存高0.3～0.4、厚约0.3米。窑床上存有草木灰和煤渣混和灰烬。灰室圆形，平底，开口与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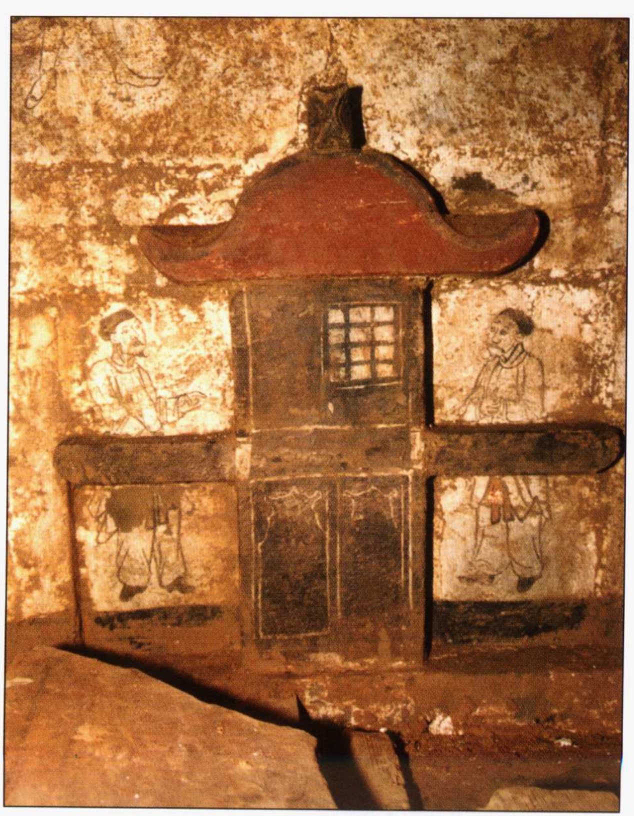
Y7清理情况



Y3金代熔制釉料的小型窑炉



窑区内发现的金墓（98JTM1）壁画



窑区内发现的金墓（98JTM1）壁画

床相平，口径1.7、底径2.1、深1.3米。充填的灰渣中混杂了大量的瓷片、完整瓷器、琉璃瓦件及匣钵，底部出有砂质炮弹形坩埚。与常见的马蹄形或馒头形窑炉相比，此窑形制极为特殊：其一，没有单独的火膛，从窑床上和灰室的灰烬完全相同看，应是直接将燃料投放到窑床上燃烧的窑，因此，它的火膛和窑床合二为一；其二，从窑室后端及周侧无烟囱痕迹分析，它是直烟窑，即烟囱开设在窑室顶部；其三，此窑规模很小，且出有砂质坩埚，可知叠置的坩埚与燃料是一起堆放在窑床上烧炼的，因此此窑应是专门用来熔炼矿物质釉料，可称之为制釉窑，使用木柴及煤的混和燃料。

Y2为晚唐五代时期的瓷窑，由火膛、窑床和烟囱组成。窑床长方形，长2.3、宽1.7米，上铺耐火砂。火膛呈半圆形，其壁以匣钵、石块、耐火砖砌成。火膛最大径为1.7、深0.7米，此窑结构的特殊之处



Y5出土印花白瓷盘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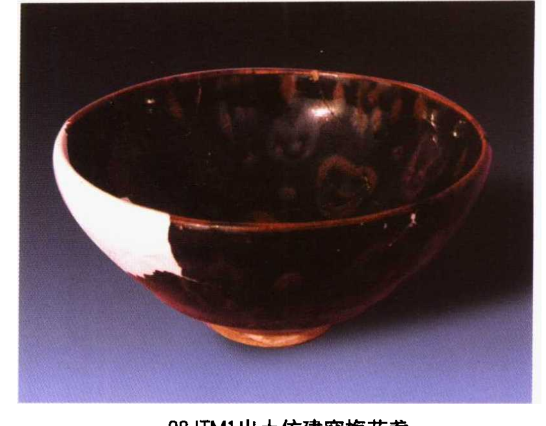


98JTM1出土金花白瓷盘



H13晚唐灰坑内瓷器


Y2出土褐釉双系葫芦瓶


98JTM1出土仿建窑梅花盏

为椭圆形烟囱设在窑床后部两侧，而不是在窑床后端。Y2燃料为木柴。

Y7为晚唐的瓷窑，由窑床、火膛、烟囱三部分组成。窑床呈长方形，长2、宽1.7米，略向内倾，上铺耐火砂。火膛呈半圆形，直径1.7、深0.9米。窑壁残存1米高，以匣钵、石块、窑砖修砌，表面抹有厚1.5～3厘米的耐火泥。窑室后端对置的两烟囱呈长方形，右烟囱里侧残留有摞在一起、已烧结的筒状匣钵，均被打破，里面的瓷器已被取走。这种超窑床装填烧件的情况，显示了我国北方早期瓷窑烟囱与窑床无烟道阻隔，直接相连的较原始形态。Y7同Y2一样，火膛内有草木灰，其燃料为木柴。

金墓(98JTM1)保存完整，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四部分构成，全长11.6米。墓门门楼及墓室内仿木砖雕三跳六铺作、二跳五铺作、一跳四铺作斗栱全依宋制。斗栱及栱眼壁彩绘几何形图案及花卉、舞蝶，线条流畅，色彩绚丽。方形墓室的穹隆顶绘有星象图，墓室四壁分别砖雕门楼、灯架、桌椅、车轿，并各配以彩绘侍女、男仆、牛马、骆驼、鸡狗、屏风和饮食器皿，墓主人端坐墓室北壁正中门楼下，门楼两侧各有一执幡接引女神像，表现了墓主人生前富足、死后安乐的景象。此外，墓室四角还绘有镇墓四神。木棺侧帮分幅彩绘二十四孝图。此墓发掘前曾被盗扰，清理出土器物23件，另外追回被盗器物21件。除滑石执壶、药砂锅、砖砚、漆器、铁门锁等，另有瓷器38件，绝大多数为井陉窑产品。

出土器物初步分为晚唐五代、宋、金三个时期。晚唐五代的遗物众多，瓷器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白瓷，以碗为多，形式丰富多样，还有杯、钵、盘、注子、瓶、壶、枕等。高档瓷除洁白莹润的细白瓷外，少量黑釉瓷中亦有胎体洁白坚致、釉色黑亮如漆的佳作。此阶段的窑具、匣钵除筒状外，多为矮壁漏斗状，垫烧工具以三角支钉最为普遍。

宋代出土器物相对较少，其中敞口碗最为普遍，此外有模印装饰的莲瓣纹碗、折腰盘、梅瓶、枕等。匣钵的形制变化不大，但垫支工具中支珠普遍取代了支钉。

金代瓷器、瓷片、窑具在此次发掘中收获最多，器种、器形、釉色及装饰手法较前大大增多。有各式碗、盏、盘、碟、盂、尊、壶、瓶、罐、盆、盒、灯、香炉、釜、枕，小瓷塑人物、动物、工具以及建筑构件等。釉色虽仍以白色为主，但黑、酱、黄、青、绿釉在数量上已占四分之一



墨、褐釉绘划花瓷片

强，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装饰方面，除印花、划花为大宗外，剔花、点彩也是常用技法，其他窑口不见或少见的戳印划花、白地黑绘划花、白地褐绘划花、白釉白地剔划花等争奇斗艳，充分显示出井陉窑所独具的特色。此类瓷片为邢、定窑系所不见，也与磁州器灰胎、彩绘有明显的区别。印花瓷片中的彩带分区，池上仙人图等为前所未见。戳印划花枕片的再次出土，又一次证实了此类花枕的产地。低温釉器亦有一定的发现。其中素烧平底深腹碗为白胎无釉的半成品。建筑构件中与黄、绿琉璃瓦伴出的还有相同规格的纯白釉瓷瓦，亦是同期罕见的发现。

出土两种珍贵瓷器残片：黑釉仿建梅花盏，斑斓的花朵，开遍器里器外；金花细白瓷平底盘，在洁白的釉色衬托下，花色金光熠熠。这两种珍贵器物的同类残片，均在窑址中被发现。

金代井陉窑窑具种类极其丰富，匣钵除筒状、漏斗状外，盆形、钵形、盘形、釜形等也多见，垫烧工具普遍为支圈。此期的发现，无论从器物还是装烧工具都充分显示出井陉窑后段的盛烧期，制瓷工艺超过了同期的定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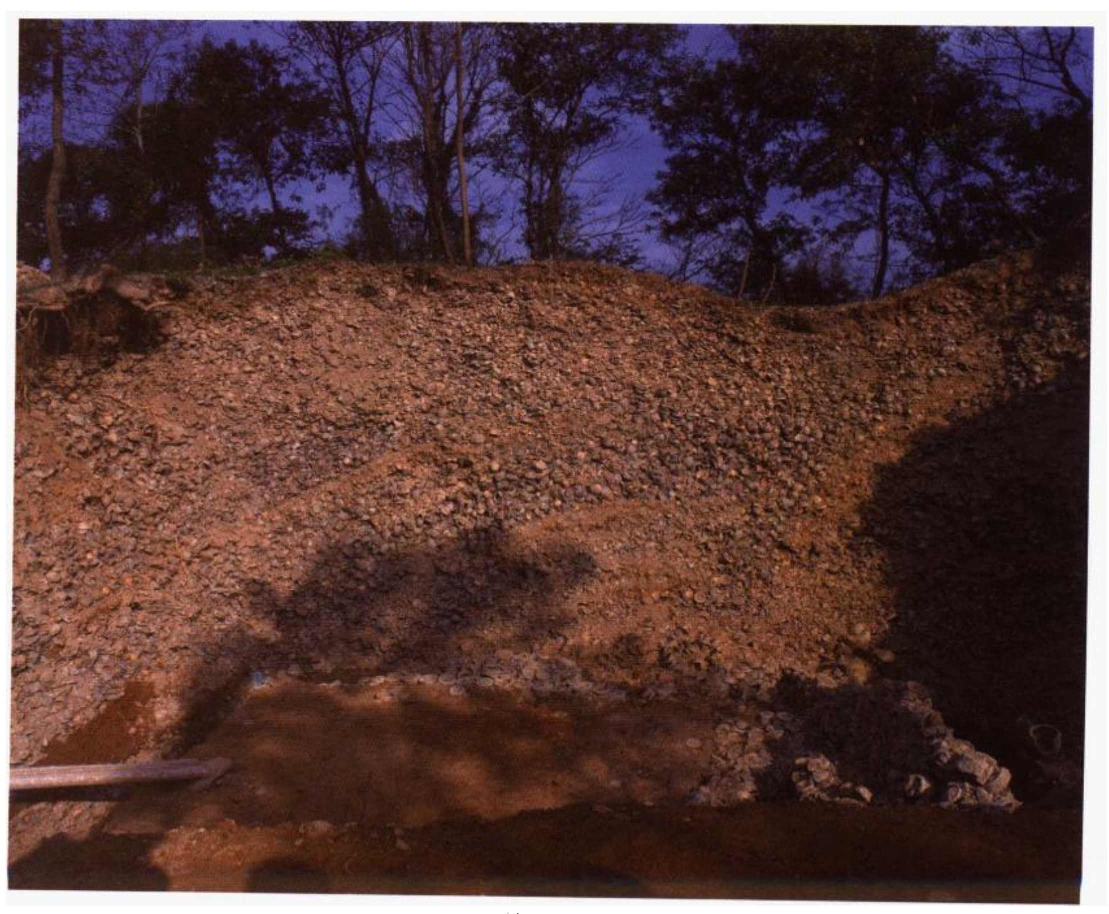
此次抢救发掘，使井陉窑的澄泥、陈腐、制坯、上釉、熔釉、装烧等主要工序得以再现；比较充分地揭露了井陉窑晚唐与金代两个盛烧期的状况，尤其是异形窑、熔釉窑等的发现，不仅有利于井陉窑的研究，也将推动整个北方古陶瓷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浙江慈溪
越窑寺龙口窑址

□ 1998年9～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了越窑上林湖寺龙口窑址。

此次发掘面积735平方米，清理龙窑窑炉遗迹1座，作坊遗迹1处，出土瓷器3万余件(片)，并获得大量窑具标本。

窑炉为依山而建的龙窑，现存窑床、



地层堆积

窑壁、窑门、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斜长50、宽约2、残高0.3米，窑床坡度12°。窑壁由长方形砖错缝平砌，内侧挂满青绿色窑汗。窑门共11个，均开在窑炉北侧，门宽0.4米左右，窑门平面呈八字形，两两相距3～5米不等。火膛呈半圆形，宽1.64、后壁高0.21米，后壁至火门1.1米。火膛前两侧有八字形墙。窑床底部铺有一层细沙。残留成行的垫柱。据窑底遗物判断，该窑炉时代应为南宋初期。

作坊遗迹发现于窑炉北侧堆积中，距地表约6米。清理出东西、南北向各一道匣钵墙，平面呈方形，地面用废弃的土渣、窑渣铺垫，匣钵墙残高近1米。

窑址的出土物主要来自龙窑窑炉北侧的堆积，遗物年代从唐末五代一直延续到南宋初期。由于确定了南宋地层，越窑烧造的下限也由北宋中期推迟到南宋初年。出土的3万余件标本，展现了晚唐至南宋不同阶段越瓷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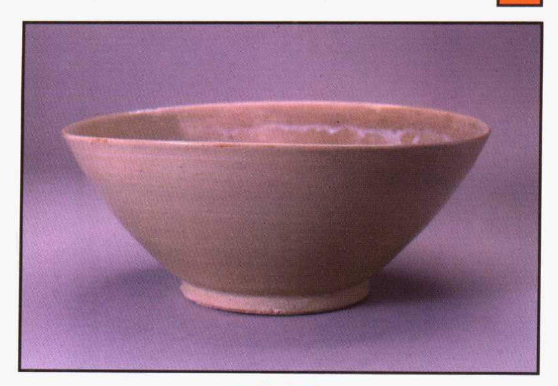
在唐末五代地层中，发现大量秘色瓷，器种有花口碗、葵口盘、小杯、执壶、折沿盆、盏和托等，其修坯精细，釉面莹润，造型端庄，烧成优良，折射出以釉色和造型取胜的时代风尚，足以代表唐末五代越窑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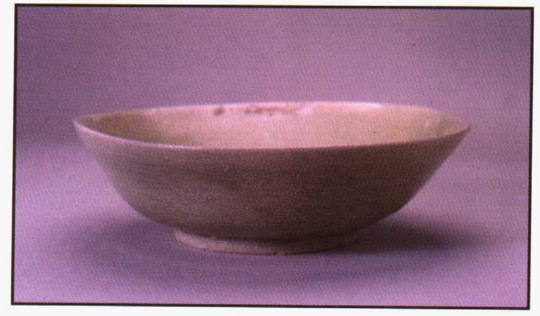
北宋时期，以刻划花为标志，越窑青瓷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单线划花、浅浮雕、刻花与篦纹结合的装饰技法，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丰富的艺术个性。其图样简洁清丽，以自然风物和民间喜闻乐见的内容为创作题材，如鹦鹉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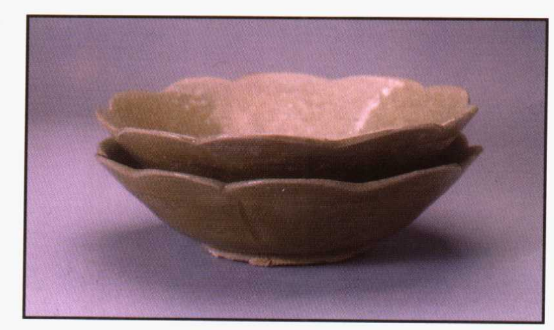


龙 窑


五代瓷碗


五代瓷碗


五代瓷碟


五代瓷碟


五代葵口瓷碗


南宋瓷器盖


北宋瓷盘


南宋瓷盘

鸣、蝴蝶相向、双凤穿枝、龟伏荷心、鸟栖花丛、儿童嬉戏，无不栩栩如生，尤以荷莲纹最习见，画面具有江南水乡的宁静秀美之气。

南宋地层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以支钉垫烧，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器种有觚、炉、玉壶春瓶、花盆、鸟食罐、棋子等，其胎质釉色、器物造型、烧成方式均与越瓷的传统风格大相径庭，却与北方的汝官制品颇接近。此类官窑型瓷器的出现并非偶然，根据地层中阴刻“官”字匣钵的出土和《中兴礼书》关于赵构政权到越州定烧瓷器的记载，表明应与南宋初期朝廷在此地征烧宫廷用瓷有直接关系。这一时期的越窑，在经历北宋末的衰落期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短暂繁荣期。



南宋刻“官”字匣钵

发掘中还出土了众多带铭文的匣钵或瓷器(片)，铭文一般刻在匣钵外壁或碗内外底心，种类繁多，计有姓氏类如“柴记”、“王”、“马”、“徐”、“朱伯远作”等；方位类如“上”、“下”、“左”、“右”；纪年类如“辛酉”、“□月初六”；用途类如“酒”、“弟子朱仁厚舍入庙”；另有吉语类和数字类。这批文字资料多数出土于五代地层中。

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为解决贡窑、秘色瓷等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南宋龙窑窑炉的清理及官窑型产品的发现，明确了南宋初期宫廷用瓷的产地，提出了越窑与汝官窑、南宋修内司窑的关系以及浙江两宋时期官、民瓷业生产体系等一系列的学术问题。

杭州老虎洞宋元窑址

□ 老虎洞窑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狭长溪沟的西端，南距南宋皇城墙不足百米，距南宋郊坛下官窑约2.5公里。

1996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老虎洞窑址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古调查，发现2座窑炉及作坊遗址，出土少量瓷片、素烧坯、窑具等遗物。1998年5～12月又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共清理窑炉1座、素烧炉3座；作坊遗址1处，包括房基4座、排水沟、道路、釉料缸2个及素烧坯和瓷片堆积等。发现了元、南宋、北宋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



南宋地层素烧炉



南宋地层建筑遗迹



南宋地层釉料缸


南宋地层出土瓷瓶


南宋地层出土瓷器盖

元代文化层堆积厚约30厘米，发现遗迹有房屋基址和直径约1.9米的馒头形素烧炉。出土大量的仿官窑瓷片和窑具。瓷片大都为厚胎薄釉，以灰胎为主，黑胎次之，有少量的灰红胎；口沿部分施青色釉，口沿以下施青灰、灰中泛黄釉，或通体施灰色釉、粉青色釉。器种有碗、瓶、盘、盆、鸟食罐、象棋子、人物或动物塑像等，其中一碗底釉下用褐彩写“官窑”2字。出土窑具包括匣钵、支烧具和垫烧具等。支烧具上发现模印文字、纹饰和动物图案等，文字有八思巴文及“之”、“大吉”、“小”等字样。图案有虎、鹿等。

南宋堆积厚20～40厘米，发现窑炉1座、素烧炉2座和建筑遗迹，出土大量的南宋官窑瓷片、素烧坯及各类支垫烧窑具、匣钵片等遗物。

窑炉为长条斜坡式龙窑，东西向沿山势向上延伸，编号为98HLY1，仅存窑炉残墙及窑基等。窑长15米，最宽处2.1米，由火膛、窑室、出烟室三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炉的东端，平面呈半圆形，火膛和窑室之间有一隔墙，窑床底部高出火膛底部0.28米，窑墙用长方形砖砌成，


南宋地层排水沟





南宋地层出土瓷片

残高0.08～0.35米；出烟室位于窑炉尾部。窑炉东南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挡土墙。

2座素烧炉平面呈马蹄形，用砖错缝平砌而成，通长1.8、最宽处1.25米。火膛呈半圆形，低于炉床0.3米。炉室深0.8、最宽处0.98、残高0.52米，炉底铺砖。出烟室位于炉的尾部，用砖砌墙与炉室分隔，隔墙底部砌出5个出烟道。在炉的左右及后面发现了大量的素烧坯堆积，故推断其为用来低温烘烤坯件的素烧炉。

4座房基由东向西依次为F4、F2、F3、F5。F2东半部的墙基用石头砌成，西半部直接在地面上砌砖墙，东、南墙保存良好，为4开间平房，房基地面略高于室外地面，门址位于房基的东南角，东西长14.8、南北宽4.1米，北墙保存有两个柱基石，地面上铺一层经夯打的紫金土。F3结构同F2，为两开间。F4柱础石和地面保存良好，面积约16平方米。地面上发现口径0.64、腹径0.72米南北并列的釉料缸2个，缸的北面有大量的素烧坯，推断该房应为上釉场所。F5西半部保存良好，室内铺砖，房基外侧的滴水沟用砖砌成倒梯形，在其南部发现多个辘轳坑遗迹，推断应为拉坯场所。



南宋地层出土瓷片

在南宋堆积文化层发现了大量的官窑瓷片及窑具，器种丰富，烧制质量好。以H3的出土物为例：H3为一边长2、深0.45米的正方形瓷片堆积坑，出土万余件瓷器碎片，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完整或可复原器。胎釉特征以厚胎薄釉、厚胎厚釉为主，薄胎厚釉少见。胎色有香灰、深灰、紫、黑等，紫口铁足现象常见。釉色以粉青、米黄色为正烧品的主流，另外还见有翠绿、灰青、黄和浅紫色等。大部分瓷片釉面有裂纹。制作工艺以轮制为主，个别为手制、模制。出土量大的器种有碗、盘、杯、罐、碟、壶、洗等日常生活用器，另有觚、琮式瓶、香炉、熏炉、器座、筷子架、花盆、灯盏等。圈足器的圈足均外撇，少量器物圈足的底部有“戎”字。窑具有


元代地层出土瓷碗


元代地层出土瓷鸟食罐


元代地层出土八思巴文支烧具


元代地层出土支烧具

支烧具、垫烧具和大量的匣钵碎片，个别支烧具上有“戎记”2字。

北宋层仅在南宋层遗迹保存较差的6个探方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100多平方米。建筑遗迹保存较差，遗物出土很少，仅见少量的五代时期越窑瓷片和陶范。

从发掘情况看，老虎洞窑址的年代跨度大，北宋末年就已存在，早期产品属越窑系列。南宋定都杭州以后，为满足宫廷用瓷的需要，选择了距皇宫较近且具备烧造宫廷用瓷条件的老虎洞窑烧宫廷用瓷。根据老虎洞南宋窑址的位置、出土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推测老虎洞南宋层窑址应与修内司官窑关系密切。

银川西夏陵
三号陵西碑亭



西夏陵鸟瞰

Stele Pavilion to the West of the Royal Tomb 3 of the Western xia Kingdom near Yinc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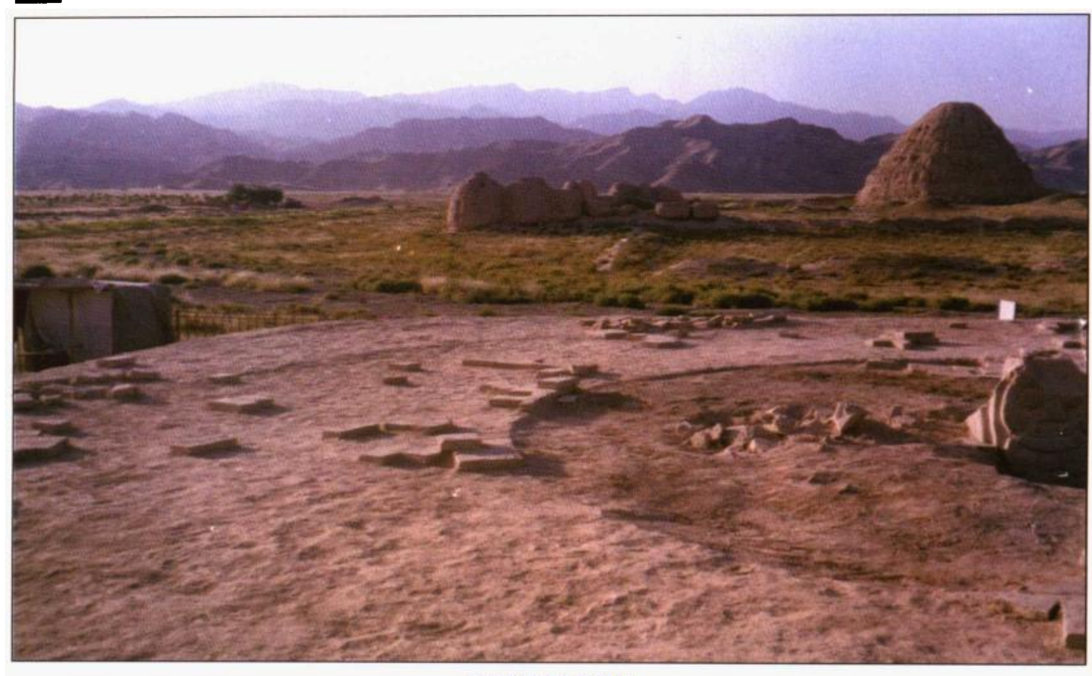
□ 1998年8～9月，在宁夏文物局的组织和西夏陵区管理处配合下，由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夏陵区三号陵西碑亭基址进行了清理发掘。西夏陵位于银川市西35公里处，分布有9座西夏帝王陵和208座陪葬墓，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西夏建筑遗址。其中三号陵园位于西夏陵区二区的东部，整个陵园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内城、献殿、陵台等组成。碑亭位于鹊台与宫城之间、陵园中轴线西侧，东西两座对称排列。此次发掘的是西碑亭(东碑亭已于1987年发掘清理)。

此次发掘，基本上摸清了碑亭的地面建筑形制是由方形台基、踏道和圆形亭式基址组成。台基在砂砾石地表上黄土夯筑而成，台体呈方形覆斗式，底面边长20.5、上底残长16.5、高2.2米，方向与陵园相同。夯层厚10厘米左右，夯窝较密。台基自底向上分三级向上收进，第一级台阶高60、面宽40～45厘米，第二级台阶高40、面宽30厘米，第三级台阶高45、面宽25厘米。踏道置于台基南侧，长11米，坡度为15°，分两次黄土夯筑。台基正面的中央部分踏道规整，为斜坡式，两侧踏道则较为零乱。碑亭圆形基址处在台基面中部，台基地面损毁严重，其残迹为大小2个同心圆组成的建筑基址轮廓。内圆直径7.6、外圆直径13.6米。内圆中心从东向西一字排列4个石雕人像碑座。碑座与碑座间距大致相等，约1.05米左右。根据对碑座坑的清理可以初步断定，是在碑亭台基夯筑好后，又在台基中心挖取出夯土，然后放置石碑座。内圈基面主要用素面方砖铺就，现大部不存。内圈与外圈之间，铺制素面条砖、梯形砖(分为长、扁两种)，亦多已不存。外圈外侧铺大方砖。碑亭柱洞分布在圆形基址外圈外缘一周及内圆圈内，共有40多个。内圆圈内的柱洞分布无规则，仅有少数几个，其平面只有圆形一种形状；外圆圈柱洞沿外圆边缘分布较为规则，其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方圆结合形等几种，未发现完整柱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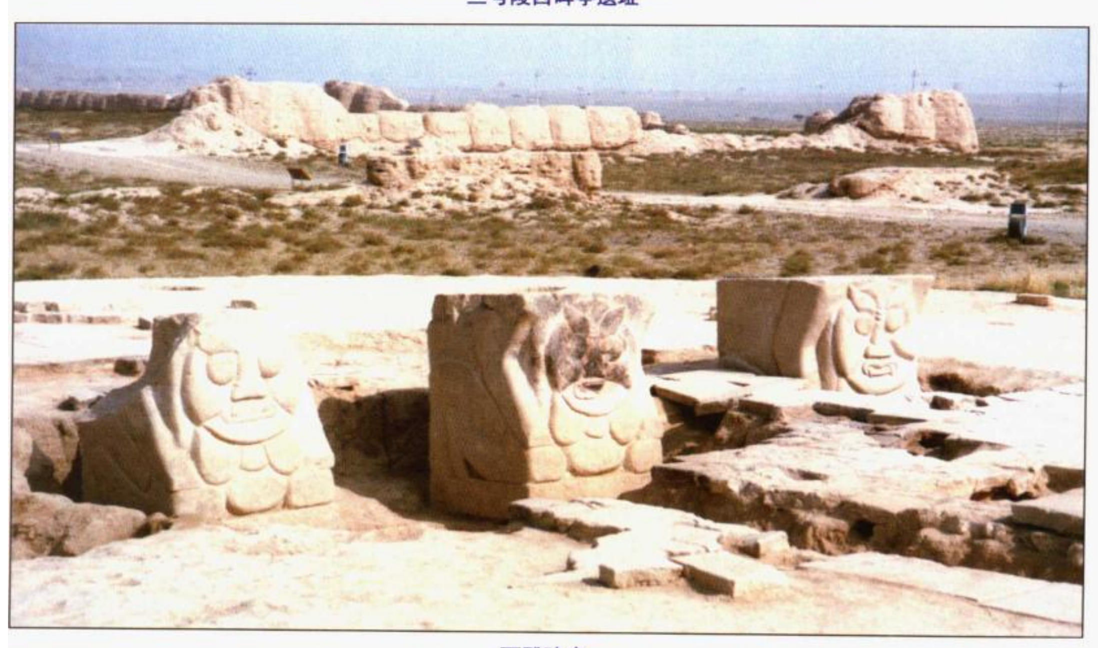
出土文物有较完整的3座石雕像碑座、西夏文残碑块、花纹砖及少量的瓷器残块、钱币、铜器、铁制工具(可能是当年夯筑碑亭时所用，与夯土夯窝大致相符)、板瓦、筒瓦、建筑饰件、动物骨骼、木炭、烧灰等。3座石雕人像碑座有2件较为完整，一件面部迸裂，经修复现已恢



发掘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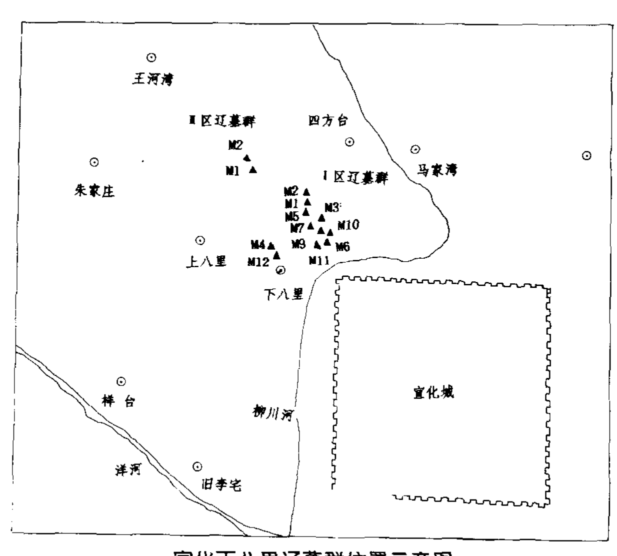
三号陵西碑亭遗址



石雕碑座

复原状。与以往在西夏陵区发现的碑座有较大不同，一是体态较高大，高约1.4米，比以前出土支座高出一倍；二是面部雕刻也与以前略有不同，且有彩绘。此次清理出西夏文残碑块300多块，4～5字以上的约有60块，最大的一块刻有17字。碑首残块有平顶、弧形之分。纹饰有云龙纹、忍冬纹等，云龙纹阴刻纹内残存描金痕迹和彩绘，部分碑残块上有描金和拓印墨迹，此为西夏陵残碑的首次发现。碑的石质为青、红色砂岩，从残存碑文字的大小、字体及行距、间距来看有3种方式。大致可判定碑亭内曾置高约3、宽2、厚0.2米的石碑2通。

河北宣化新发现
两处辽金壁画墓



宣化下八里辽墓群位置示意图

□ 1998年3月，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现1座古代砖室墓。接到报告后，当地文物部门及时进行了抢救清理。该墓编号为M12，位于过去发现的辽代韩师训墓东南20米处，为砖券穹隆顶圆形单室墓，方向坐北朝南，由墓道、墓门和墓室组成，由于墓道被民房所压，故未做清理。

墓门门楼为砖雕仿木结构，高2.23、宽1.5米，上部为砖雕屋脊、板瓦、椽子、斗栱、门楣，下部是拱形墓门，高0.98、宽0.6米，整个门楼底色涂红色，椽头、斗栱、栱眼壁、门楣、拱门外框上有花卉、祥云等图案，出土时色彩仍十分鲜艳。

墓室呈圆形，直径1.6、高1.7米，北面设须弥座棺台，高0.4、长0.9、宽0.6米，用边长0.38米方砖墁地，在墓室西壁做出砖雕灯台。该墓葬早年被盗，墓室内充满淤泥。清理出土了白瓷花口盘、花口碗、墨书梵文的棺箱残片和火化后的碎骨等物。墓室内壁绘有四幅壁画：西壁绘一妇人，上着浅蓝色小花上衣，下穿白色小花长裙，袖手立于圆壶门式盆架旁，架上置花口大盆一个，左方悬一腰鼓形带锁皮箱。东壁有盗洞一个，壁画部分遭到毁坏，残存部分绘一妇人，盘发，上身穿白色小花上衣，下身穿浅蓝色小花长裙，肩处一把绘花团扇，站立桌旁，桌下放一酒坛与一圆形带锁箱子，桌子以上的壁画被毁。北壁绘花鸟屏风，画中鸟雀展翅飞舞。墓顶绘有星图，但已漫漶不清。壁画大部分画面清晰，色彩搭配得当，人物线条流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该墓比前些年发现的墓葬规模要小很多，墓室内只能一二人容身，高度也仅



Ⅰ区M12西壁壁画



Ⅰ区M12彩绘墓门



Ⅱ区M1 外观



Ⅱ区M1 墓室



Ⅱ区 M1 西南壁壁画



Ⅱ区 M2 东南壁壁画



Ⅱ区 M2 西南壁壁画



Ⅱ区 M2 东壁壁画



Ⅱ区 M2 西壁壁画

1.7米。由于没有发现墓志和其他纪年文字，无法知道墓主人身份和准确的纪年。从墓葬结构、壁画内容、绘画风格及出土器物看，该墓接近下八里墓群内的张世卿墓（1116年）、张世古墓（1117年）、张恭诱墓（1117年），当属辽代晚期或金代初期墓葬。该墓位置靠近韩师训墓（1110年），很可能属韩氏家族。

1998年9月，下八里村民在村北约500米处取土时，发现2座辽代石室墓，编号为2区辽墓群M1、M2。其中1座墓顶与部分墓室已暴露于地表之上，当地文物管理部门及时进行了抢救清理。

2座石室墓相距20米，均为八角形单室墓，方向坐北朝南，形制相同，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1号墓墓道已毁，2号墓墓道长5、宽1.1米。墓门是由一块宽1、高1.3、厚0.3米的石板雕凿而成，正面雕刻出抱框、门楣、门簪、坎框，中间一条垂直刻线，表示板门为左右两扇。八角形墓室内宽度东西为3.7、南北约3.82米。墙壁是用整块梯形大石条垒砌而成，共5层，高1.7米。墓顶也呈八角形，叠涩法筑成穹隆顶，上压八角形盖顶石，墓室高度3.34米。

两座墓均早年被盗，室内严重扰动。1号墓葬男性尸骨一具，尸骨外罩铜丝网络。另外葬有仿真人的木偶2躯，均为女偶，腹部凿空，内置火化后的骨灰，骨灰用丝绸包裹。木偶为柏木圆雕，长1.5米，全身由17个部件组成。其肩、肘、髋、膝、踝关节用插榫连接，可以摆动弯曲；上臂、手、大腿部位用转轴套接，可以左右转动。面部、手、脚部位雕刻技法极为精致。同时出土的还有木俑、残白瓷盘等。2号墓内有0.9米厚淤土，清理时也发现身罩铜丝网络的尸骨和散落的骨灰。随葬的木制品均已腐朽，未发现木偶像。另外还出土影青瓷和辽白瓷注碗残片及水晶坠饰、漆器残片等物。

II区M1出土木偶

墓室内均用白灰抹面，墓顶绘有仙鹤、祥云、花卉及表示十二生肖的人像图案。两座墓共绘反映墓主人日常生活和娱乐活动的壁画26幅，有散乐图、点茶图、温酒图、备弓箭图、牵马持马球杆图、侍女图、孝义故事图及奇石花草屏风图。画面线条流畅，色彩鲜艳，人物姿态生动。M1中孝义图，均出于二十四孝义故事。M2东南壁的壁画，为一马夫左手持杆，右手牵马，马后立一髡发男童，双手拿着两根长柄弯头酷似现在曲棍球杆的马球杆。

两座墓葬均没有发现墓志和其他纪年文字，但从墓室结构看，八角形的石室墓多见于辽代晚期，从壁画内容、绘画风格看，接近于辽代晚期的宣化辽代张世卿家族墓。孝义故事图与1995年河南宜阳出土的北宋徽宗时期画像石棺上刻的孝行图，从画面布局、人物特征、画像内容及表现技法上都十分相近。另外，M1出土的木偶与辽天庆二年（1112年）马直温墓、天庆六年（1116年）张世卿墓出土的木偶十分相似。故两座石室墓应该属于辽代晚期。墓主人身罩金属网尸服，是辽契丹贵族流行的葬俗。



耶律铸夫妇墓外观

北京元耶律铸夫妇合葬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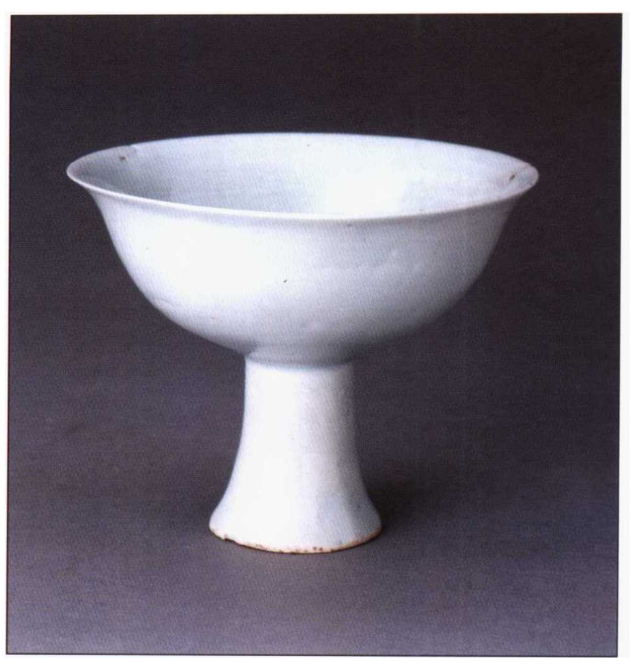
□ 1998年9月，北京颐和园新建地下文物库房工程施工中发现1座砖室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人员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确定该墓为元代耶律楚材次子耶律铸夫妇合葬墓，是近年来北京地区发现的保存较完好、规模较大的元代墓葬。

该墓为正南北向，为多室砖墓，由墓道、墓门、前室、前室的东西侧室、后室及后室的两个侧室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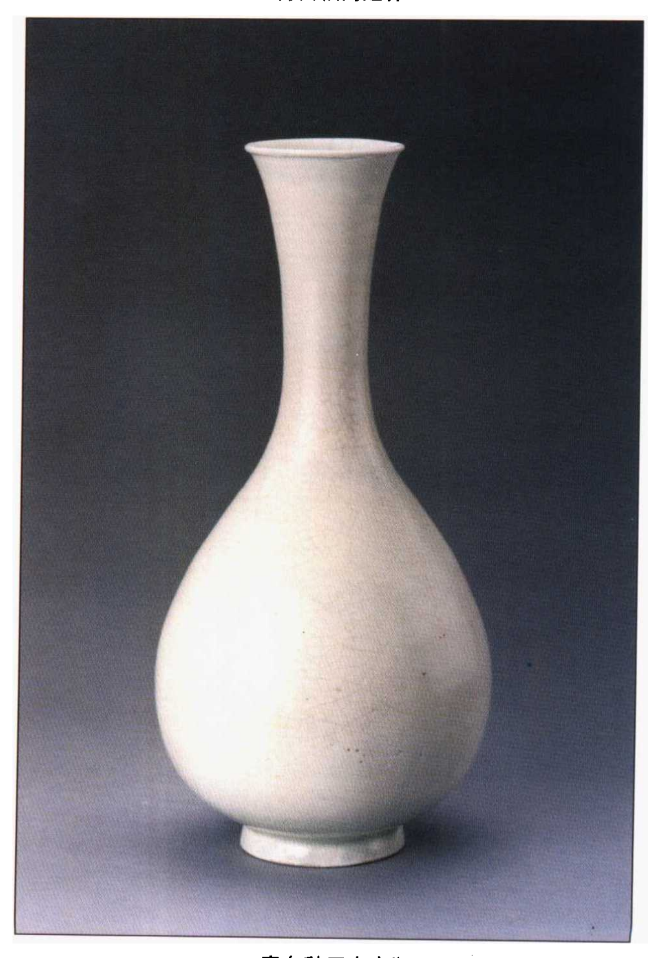
墓道位于前室南侧正中，距墓门1.48米处墓道上方并列立有圆额墓志两块，墓志外侧有砖砌基槽。墓门位于前室南侧，门楼为砖雕仿木结构，残存砖雕斗栱、普柏枋、门楣、门簪，下部中间为拱形墓门。

前室及其东西侧室均为长方形砖砌穹隆顶结构。其间均有甬道相连，甬道为圆拱结构。前室2.45米见方，残高2.1米；东侧室南北2、东西2.4、残高2.23米；西侧室南北2、东西2.3、残高 2.18米。三室北半部均设棺床，用3层砖垒砌，宽1.06、高0.17米，棺床面用方砖平砌。棺椁均已朽坏，部分散落于墓室内，形制不可辨。

后室位于前室北侧，与前室间并未有甬道相通，其南壁距前室北墙外壁约1.8米。后室南壁有圆拱形门洞，宽0.94、高1.41、进深0.5米，用单层砖以直列人字形封堵，外侧抹白灰，保存完好。后室南北2.78、东西2.8、高2.9米。墓顶中央留一直径0.15米的圆



青白釉高足杯



青白釉玉壶春瓶



陶力士俑



陶十二时俑



陶侍女俑



陶女俑



陶 龙



石 马

孔，应为悬挂铜镜之用。东壁北侧有一近方形盗洞。在东西壁正中及四角处距墓室底面约2米高处嵌入6枚铁钉，应为悬挂幔帐之用。棺床位于墓室中后部，用2层砖垒砌，东西与墓室壁相接，南北宽1.23、高0.14米，床面用方砖错缝平砌。棺床上置一棺一椁，棺椁东西向放置，棺椁上部被毁，朽木板散落于墓室中。各室地面均使用方砖铺地，内壁均抹白灰，未见壁画。

后室东侧并列有两个南北向的侧室，均为长方形砖石混砌券顶结构。东侧室南北长3.08、东西宽1.6、高1.6米，东、南、西壁均用石块垒砌，上部用砖做券顶，北面外侧有一重封门砖。墓室内方砖铺地，内壁均绘有壁画，壁画已残毁，依稀可见云朵、花草、鸟兽等图案。该室未被扰动，保存完好。西侧室位于后室与东侧室之间，其西壁紧贴后室东壁，该室结构与东侧室大体相同，南北长2.8、东西宽1.1、高1.38米，石板铺地。

以上各墓室分别发现残存的尸骨，尸骨均已散乱，根据墓室规格及随葬品可知，后室葬者为墓主人耶律铸，前室埋葬其妻奇渥温氏，前室的东西侧室为耶律铸的妾媵，而后室东侧的两个侧室死者身份有待进一步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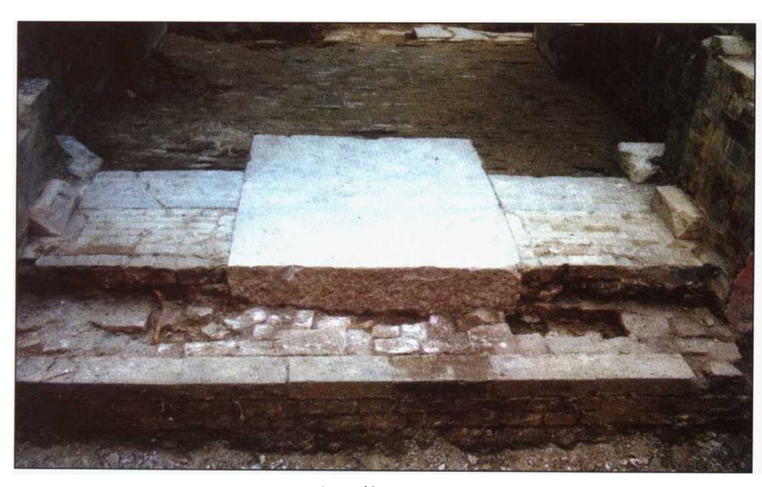
石 狗

该墓虽早期被盗，出土的随葬器物仍十分丰富，有瓷器、陶器、银器、石器及装饰品180余件，其中汉白玉石马、石狗雕刻工艺精湛，造型生动；一组8件玉石质明器，有盘、碗、钵、盏托；陶俑48件，有手执立牌的十二时俑、捧持各类生活用器的男女仆役俑等，动物模型有龙、凤、马、骆驼等。另外，青白釉高足碗、玉壶春瓶、影青双鱼盘、“福寿千秋”双鱼铜镜等均堪称精品。

发现两块墓志，其一为汉白玉石质，下部有汉白玉石基座，为“大元故光禄大夫监修国史中书左丞相耶律公墓志铭”；另一块为“故郡主夫人奇渥温氏墓志铭”。墓志记载耶律铸生于辛巳年(1221年）五月初三日，卒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四月十二日；其妻奇渥温氏卒于同年三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两人同时下葬。

该墓西北紧邻颐和园内的耶律楚材祠，因此可以确定此处为耶律楚材的家族墓地。

南京明孝陵陵宫门遗址



2号门门槛石及砖砌结构



2号门门臼石

□ 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建筑形制开明、清两代皇陵建设规制的先例，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98年7月，南京市文物研究所结合孝陵宫门的保护工程，对陵宫门基址进行清理发掘。发掘对象包括陵宫门正门三洞和东、西掖门，并在东掖门外开挖探沟一条。

陵宫门的5个门道均保存了砖砌路面、门道墙残基、门臼石、门栓洞等遗存，其中正门三洞结构相同，据保存的遗迹推测，正门三洞为券顶式，东、西掖门顶部为过梁式。



3号门内侧路面砖础



4号门内墙散水遗迹

门道内门臼和放置门槛处均用青石铺成，其余用砖竖砌。门道基础由7层砖砌成，砖下还有一层厚10厘米左右的纯净黄黏土作基础。砖之间以白色粘接剂粘接，非常牢固。以2号门为例，门宽3.07、深3.8米。门道两壁用大砖磨砖对缝砌成，砖规格一般为43×17×9.8厘米。两壁前后凸出0.26米，形成中部的门槽。门道路面外侧以3块青石板砌造，石上留有清晰的门槛痕迹，门槛原宽度约



5号门门道及内侧石板路面


4号门门道及内侧砖砌路面

为0.24米。门臼石长0.93、宽0.29米，露出地面部分高0.12米，其中部开槽以置门槛，石上部边缘均割角。臼窝平面方形，内原应置有外方内圆的铁质门臼。门臼石以上0.98米处的墙壁面上开有长0.32、宽0.35、深0.42米的门闩插孔。

在5座门道向陵宫内延伸部均发现了路面。3号门路面基础和5号门路面、路基保存较为完好。3号门路面已不存，但基础尚存，皆用大砖砌成，砖之间填以白色粘接剂。经钻探，4号门和5号门的路面一直向前延伸至孝陵享殿门基址一线。路面砖基之下也用纯净黄黏土作基础，黄土厚15～20厘米。以5号门路面为例，路面用双层青石板铺成，石板下用2层大砖平砌成基础，砖基下再用黄土做垫基。现存石板路宽2.92、清理部分长1.5米。石板和石板之间以企口相接。


琉璃建筑构件


琉璃瓦当


琉璃滴水

在4号门内侧发现一段长约4米的散水遗迹，用斜面式特型砖砌造，散水顺墙延伸，距墙基宽约0.8米。

发现的遗物主要是琉璃建筑构件，包括脊瓦、板瓦、筒瓦、龙纹瓦当、斗栱、椽、檩等黄、黑、绿色琉璃制品。在5号门外探沟内出土南朝至唐代青瓷片，唐宋时代的陶瓦当、筒瓦和板瓦，宋代青白瓷、黑瓷、青瓷，明清时代的青花瓷、“乾隆”年款钱币等。

这次明孝陵陵宫门基址的清理发掘是明孝陵地区范围内的一次重要考古工作，所获资料对研究明代早期建筑特别是皇陵建筑具有积极意义。